

創建中國同盟會

一、推動革命高潮的到來

在歷史進入二十世紀，革命形勢迅速發展，群眾廣泛傾向革命的時候，為了進一步推動革命浪潮的高漲，孫中山風塵僕僕，四處奔走，熱情宣傳，積極擴大革命隊伍。

早在義和團運動爆發之前，孫中山即在留日學生中開展工作，支持其中的激進分子從事革命活動。惠州起義失敗後，孫中山一面總結起義失敗教訓，一面繼續在旅日的知識分子中開展工作。

十九世紀末葉以後，受到民族危機不斷加深的刺激，一批批青年學生帶著尋找救國真理的熱切願望，紛紛到國外留學。離中國最近的日本，中國留學生去得最多。一九〇〇年（光緒二十六年），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約有百餘人，一九〇二年後陡增至千餘人。留日學生中不少著名的革命活動家如黃興、鄒容、陶成章、廖仲愷和何香凝等，都是在一九〇二年到達日本的。在這些留日學生中，雖然絕大部分人充滿著愛國救亡的熱情，但他們多數暫時還沒有接觸到最尖銳的政治問題——革命的問題。他們普遍存在著一個模糊的想法，認為中國之所

以衰弱和被侵略，主要在於文明的落後，因此到國外去最迫切的任務，就是要學習新知識，把它們介紹到國內，提高國民的覺悟程度。

針對大多數留日學生的這種思想狀況，孫中山把對他們的工作重點，放在支援部分主張革命的激進分子在留日學生中開展革命宣傳活動上。其中受到孫中山直接啟發、幫助的，有秦力山、劉成禺和章太炎等人。在孫中山等人的努力下，留日學生中的革命思潮逐漸高漲。一九〇二年冬，留日學生中的激進分子秦毓鎰等二十餘人，發起成立了青年會，「明白揭示以民族主義為宗旨，以破壞主義為目的」，表明他們已開始趨向革命。

這時孫中山雖注意在留日學生中開展工作，培養革命的種子，但他當時對於日益壯大的愛國知識分子隊伍在中國革命中即將發揮的重大作用，還缺乏足夠的估計，而對於爭取歐美各國對中國革命的援助尚抱有很大的期望。所以，他在一九〇二年十二月離開了日益擴大並且趨革命化的留日學生群體，前往越南河內謀求法國殖民當局對中國革命的支持。

孫中山在河內了半年多，其間謀求法國支持的努力並無結果，而在發展革命力量方面則取得一定進展。他在河內建立了興中會分會。三年後，這個分會改組為同盟會越南分會，曾在同盟會發動的欽廉、鎮南關、河口三次武裝起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孫中山逗留河內的這段時間裡，形勢有了很大的變化。突出表現為，在留日學生和上海地區知識界中掀起了火熱的愛國運動，眾多的知識分子從愛國的立場出發，迅速地走上革命的道路，革命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

促使眾多知識分子投身革命的，是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發生的拒法、拒俄運動。這年四月（陰曆三月）間，廣西巡撫王之春欲借法國軍隊鎮壓廣西的農民起義，激起上海愛國人士的激烈反對。接著，由於沙俄背棄協議，拒絕撤回在義和團運動期間乘機佔領中國東北的軍隊，並向清政府提出七項新的侵略要求，妄圖永久霸佔東北，引發了留日學生與上海愛國知識界轟轟烈烈的拒俄運動。這一運動的性質並未超過一般愛國運動的界限，但清王朝卻以「名為愛國，實則革命」為由，下令逮捕愛國青年。這樣，清政府就充當了一名出色的「反面教員」，逼使眾多知識分子在「愛國無路」的情況下，迅速走上革命的道路。黃興、陳天華等人，相繼回到國內從事革命的組織活動。

緊接著，鄒容所著《革命軍》一書在上海出版，章太炎則在《蘇報》上發表了《駁康有為論革命書》與《革命軍序》。鄒容在《革命軍》中，以通俗的筆調，有力地揭露了封建專制制度的罪惡，論述了革命的必要性與正義性，提出了用革命手段結束君主封建專制制度，建立「中華共和國」的口號。全書文字生動，激情洋溢，產生了巨大影響。章太炎的文章，則從批判改良主義的角度，論述了革命的巨大意義。改良派企圖以會流血犧牲來嚇唬人們不要革命；章太炎則從歷史上論證，人民群眾要取得政治上的權利，實現民主政治，革命和流血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完全必要的。改良派誣衊人民智力、道德低下，不配革命；章太炎則用具體的歷史事實來論證革命的實踐，正是提高人民覺悟的有效途徑。改良派以革命會引起社會紊亂為藉口，來反對革命；章太炎則指出革命是明公理、去舊俗、補瀉兼備的良藥。改良派歌頌

光緒帝為「今上」聖明；章太炎則直斥光緒帝為「載活小丑，未辨菽麥」。全文論證嚴密，筆鋒犀利，是革命派對改良派正面進行批判，戰鬥力較強的第一篇文章。鄒容、章太炎反清革命論著的發表，在群眾中引起巨大反響，清王朝極為恐懼，勾結帝國主義租界當局逮捕了章、鄒兩人，釀成轟動全國的「《蘇報》案」。清政府的反動面目再次暴露，越來越多的人踏上了反清革命的征程。

在革命浪潮飛速發展的形勢下，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孫中山從越南返回日本，繼續在留日學生中積極開展革命活動。同年八月，孫中山在東京青山練兵場附近秘密創辦了一所軍事學校，培養革命的軍事幹部。這所學校前後辦了半年左右，共有十四名中國留日學生在這裡接受訓練。該校的創辦，體現了孫中山一貫重視武裝鬥爭的鮮明特點。

同年九月，孫中山在留日學生進步刊物《江蘇》雜誌第六期上，以「逸仙」署名，發表了《支那保全分割合論》一文，駁斥了一些日本帝國主義分子所謂「保全」清王朝和「分割」中國領土的謬論，指出：「就國勢而論，無可保全之理也；就民情而論，無可分割之理也。」孫中山強調，清政府的腐敗統治正被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民所唾棄，企圖繼續「保全」這樣一個腐朽政權是絕對不可能的；而義和團的英勇鬥爭，則充分反映了中國人民反抗侵略的堅強意志，外人如膽敢瓜分中國，中國人民必將「出死力以抗」。這篇文章的發表，顯示了孫中山對革命宣傳工作的進一步重視。

隨後，孫中山從日本動身，前往歐美。此行的主要目的，是針對康、梁等人在海外各地

華僑中大肆散佈的保皇論調和對革命派的攻擊，從政治上和理論上開展對改良主義的批判，肅清改良主義的影響，把群眾爭取到革命的旗幟下來，改變各地興中會組織軟弱渙散的局面，並成立新的革命團體，來領導日益興起的革命運動。

孫中山首先到了檀香山。這裡原是興中會的誕生地，但自從梁啟超等人破壞後，興中會的力量損失很大。孫中山抵達後，連續發表扣人心弦的演說，並在當地報紙上撰寫了《敬告同鄉書》和《駁保皇報》等長篇文章，痛斥保皇謬論，闡述革命道理。孫中山強調，中國要擺脫瓜分危機，要謀求國家的富強，就必須推翻清政府的統治，掃除這塊擋道的絆腳石。康、梁等人極力鼓吹的保皇論調，是要束縛人們的手腳，阻止人們去參加革命，結果必然是清政府的統治依然維持，廣大中國人民繼續受苦受難。孫中山明確指出：「革命、保皇兩事，決分兩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東西之不能易位。」大聲疾呼革命是救國的唯一出路，號召愛國僑胞人人「大倡革命，毋惑保皇」。

孫中山的演說，明白易懂，感染力強，聽講者十分踴躍，每次都在千人以上。他的文章，論據嚴密，說理透徹，具有無可辯駁的威力。在孫中山的教育、鼓動下，許多原來受騙脫離興中會的人相繼歸隊，並先後有一批新會員加入。此後，當地興中會的活動日有起色，保皇會的勢力則大為削弱。

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春，孫中山抵達美國，繼續在華僑中以及在美國人民中抨擊清政府的腐敗統治，揭露保皇派的虛偽面目，宣傳反清革命的思想，擴大了革命派的影響，

爭取了一批革命的同情者和參加者。

同年十二月，孫中山離開紐約，前往倫敦。當時在比利時、法國和德國，有一批富有愛國熱情的中國留學生，其中很多人原是湖北地區青年學生中傾向革命的激進分子。他們聽說孫中山到了英國，非常高興，馬上派代表前去邀請與他們會面。

次年初，孫中山來到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與在那裡的中國留學生一起商量革命大計。這次討論一共持續了三天，其中一個中心話題是怎樣看待發動知識分子參加革命的作用。留學生認為應重視在新軍和知識分子中間發展革命力量，孫中山起先不同意，打趣說「秀才不能造反，軍隊不能革命」。留學生便詳細介紹了湖北地區革命的知識分子打入軍隊的情況。孫中山聽了很高興，但仍認為依靠會黨暴動可靠。留學生則以長江中下游一部分原先贊成革命的會黨力量，得知改良派「富而多資」轉而參加自立軍起義的事例，以及會黨內部較渙散等情況，提出異議。討論過程中，孫中山仔細傾聽留學生們的看法，收穫很大。在這以前，雖然留日學生和國內知識分子中許多人已轉向革命，但是孫中山的思想一時還沒有跟上形勢的發展，仍把活動重點放在聯絡會黨和向華僑籌款等方面，同留學生中的激進分子雖也有所接觸，但並未傾注太多精力。因此，雖然留學生及國內知識分子中的革命情緒日漸高漲，孫中山卻沒有及時加以引導和組織。這次討論，使孫中山的認識有所改變，他明確表示：「吾輩以後當發展革命勢力於留學界，使分途做領導人，則會黨之流弊可減少也。」留學生們也被孫中山堅定的革命信念和虛懷若谷的風度所折服，紛紛表示願意在孫中山高舉的革命旗幟下，

為拯救祖國衝鋒陷陣。

討論到最後，留學生們決定宣誓加入革命組織。孫中山當場用毛筆書寫了「驅除鞑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誓詞。一位名叫朱和中的留學生，接過孫中山書寫的誓詞仔細一看，不禁笑出聲來。孫中山不免有些詫異，忙問為何發笑。朱和中告訴孫中山：「以前康、梁等人說你目不識丁，今日見你書寫的誓詞文字簡練，書法雋永，可見康、梁等人完全是一派胡言。」眾人聽了，也都開懷大笑。

當孫中山在歐美積極活動時，國內的革命形勢正以迅猛的勢頭在向前發展。自拒法、拒俄運動和「《蘇報》案」以後，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留學國外熱潮的推動，出現於二十世紀初年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群體，以空前的規模，衝破舊的精神枷鎖，紛紛傾向革命。這些小團體的成立，為建立全國性的革命團體，在組織上做了準備。

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以後，留日學生中的革命思想也在急劇高漲，贊成革命的人



一九〇四年二月，黃興（前排居中）等人在長沙成立了革命團體——華興會。圖為黃興與留日學生中的部分會員在日本留影。

越來越多，並突破了原先同鄉會的範圍，出現了跨省區的革命團體。同年十二月，由黃興、宋教仁等人發起，湖南、雲南、直隸、江蘇等省留日學生一百餘人成立了革命同志會。它的出現，反映了當時許多革命青年要求突破地域性的限制，實現更廣闊範圍內聯合的強烈願望。此外，宋教仁、陳天華等人還一起創辦了《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從它的刊名和成員來看，也都在突破地域性團體的狹隘圈子。

形勢的發展，要求人們迅速將各地分散的革命力量聯合起來，建立一個全國性的統一的革命組織，以迎接全國規模革命運動的早日到來。聯合，已成為革命形勢發展到這一階段的必然要求；團結，是當時每一個愛國者的共同願望。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在二十世紀初年的明顯發展，也為這種全國性資產階級革命組織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階級基礎和物質條件。

就在這個關鍵時刻，遠在歐洲的孫中山審時度勢，高瞻遠矚，決定立刻返回日本，抓住大好時機，團結各方面的革命力量，建立一個全國性的統一的革命組織，領導和推動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更大發展。

二、各地的革命潮

震撼中國大地的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被帝國主義和清朝統治者聯合鎮壓下去了。一九〇一年，清政府與英、俄、美、德、日、奧、法、意、西、荷、比十一國代表，在北京簽訂了出賣大量主權的《辛丑合約》。這一條約，使帝國主義進一步對中國的軍事、政治、經濟等

方面加強了控制和掠奪。單是賠款一項，就四點五億兩白銀。從此，清政府不但割地賠款，助紂為虐，為帝國主義清除仇敵地方，而且要「永禁或設或入與諸國仇敵之會」，還公然提出他們的對外方針是「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²⁴，完全變成了帝國主義者的忠順走狗。

帝國主義和清朝政府緊密地勾結在一起，結成了反動的政治同盟，把更加沉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枷鎖套在中國人民的脖子上。帝國主義不僅在中國強佔所謂「租借地」，劃分「勢力範圍」，侵略邊疆地區，還加緊在中國投資設廠、開礦、築路和擴張銀行活動範圍，進一步掠奪中國的各種權益，控制中國的財政經濟命脈。它們還派遣大批披著宗教外衣的人員，混入中國，進行思想和文化侵略。並在各地調查資源，進行間諜活動。又勾結地方官吏，任意霸佔人民的田地房產，為所欲為，無惡不作。清朝政府則依靠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進行殘酷的搜刮，打著舉辦「新政」的幌子，巧立名目，增加許多新的捐稅。當時的苛捐雜稅，層出不窮，多如牛毛，連騾馬、草料、糞便都要上捐。一八九九年以前，每年財政收入是紋銀八千萬兩，一九〇三年增加到一億兩，一九〇八年又增加到二點三億萬兩，一九一〇年再增加到三億兩。十年之間，使人民的負擔增加了三四倍。此外，還發行「昭信股票」²⁵，舉辦「賠款捐」，對人民任意敲詐勒索。農民納稅，

24 《上諭》（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國家檔案局明清檔案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下冊，中華書局一九五九年版，第九百四十五頁。

25 「昭信股票」，是清政府在一八九八年為了籌集甲午中日戰爭失敗後對日本的巨額賠款而試辦的國內公債。因為這種公債實際上是欺騙性質的硬性攤派勒索，所以遭到了廣大群眾反對。

往往一兩銀子的稅款，有四、五兩的附加。地主階級依靠強力兼併土地，全國土地更加集中，農民大量破產；豪紳地主對佃農、雇工的壓迫和剝削，敲骨吸髓，日益加重。這種極端腐敗、反動的統治，殘酷的壓迫與剝削，逼得廣大勞動人民走投無路，賣妻鬻子，家破人亡。

喪心病狂的清朝統治者，生活極度糜爛腐化。早在一八九四年，為了給掌握最高權力的慈禧太后過六十歲的生日，僅修理頤和園就挪用海軍建造費達八百萬兩銀子。八國聯軍撤退後，一九〇一年十月，慈禧太后帶行李車三千輛，從西安返回北京，途經開封舉辦「萬壽慶典」，大收貢品。回到北京就「大修頤和園，窮極奢麗，日費四萬金，歌舞無休日」。為了保存慈禧太后脫落的頭髮，竟不惜用一百多兩黃金鑄成存放頭髮的髮塔。皇帝做一件衣服要用上千兩銀子，吃一頓飯要用上百兩銀子。大貴族榮祿嫁女兒時，僅是他的門房得到的賞賜就有三十二萬兩銀子。全國人民看穿了清朝政府的腐敗與兇殘，逐漸認識到這個賣國政府是全國人民的公敵。

當時社會上普遍流傳著這麼一首歌謠：

這世界，不得了！

富的富（得）不（得）了，

窮的窮（得）不（得）了。

不造反，不得了！

這不僅反映了當時社會矛盾的極端尖銳化，而且道出了廣大勞動人民不忍黑暗，要奮起反抗的心聲。

中國人民群眾日益覺醒了。自義和團運動以來，農民、手工業工人和其他勞動群眾，連續不斷地在全國各地掀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風暴，如一九〇二年到一九〇五年間，各地舉行的武裝起義就有廣西皈朝和興義三合會領導的農民起義（一九〇二年六月）；有李紀堂與原太平天國將領洪全福領導的廣州起義（一九〇三年一月）；有王和順為首的南寧地區和陸亞發為首的柳州地區的農民起義，該次起義曾控制了廣西數十州縣，參加起義的有漢、壯、苗、瑤等族群眾幾十萬人（一九〇四年）；有黃興、馬福益領導的華興會謀劃的長沙起義（一九〇四年十一月）等，正在逐漸形成持續高漲的革命形勢。

當時，隨著民族資本主義的初步發展，辦學堂和出國留學風氣的盛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隊伍迅速擴大。知識分子中的一批人，在嚴重的社會危機和民族危機之下，因熱愛祖國逐步走上了挽救國家危亡的民主革命道路。其中有很多人，為了尋找真理，紛紛到國外留學。日本離中國最近，向西方學習又有成效，所以到日本留學的人最多。一九〇六年去日本留學的達八千多人，去歐美各國的也不下幾千人。

一九〇三年後，資產階級革命派的知識分子在政治上表現得非常活躍，他們在日本和國內先後出版了大批書報雜誌，宣傳反清革命和民主思想。其中特別是鄒容的《革命軍》、章炳麟（太炎）的《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和陳天華的《猛回頭》、《警世鐘》等著作，更是轟動一時，

影響很大。這些書的作者充滿著強烈的愛國感情和旺盛的革命意志，無情地揭露了清朝政府對人民殘酷壓榨和媚外賣國的罪惡，痛斥改良派反對革命的謬論，熱情地歌頌中華民族的偉大，歌頌革命事業的偉大；宣稱革命是「至尊極高，獨一無二，偉大絕倫」之壯舉，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順乎天而應乎人」的偉大行動。指出獻身革命是每一個人不可推卸的責任，無論「老年、中年、壯年、少年、幼年，無論男女」，都要「相存、相養、相生活於革命」。這些著作強調調要「殺盡胡兒（按：指清朝統治者）方罷手」，殺退外國侵略者，清除為侵略者效勞的漢奸走狗。號召人民對內要和「愛新覺羅氏（按：清朝皇族的姓）相馳騁於槍林彈雨之中」，對外要掃蕩侵犯中國主權的「外來之惡魔」。孫中山積極支持這些民主革命思想的傳播，他在一九〇四年一次就刊印《革命軍》一萬多冊，分寄美洲、南洋各地。又指示在新加坡的革命黨人趕印這本書，分送到各處。同時，還大量翻印《猛回頭》和《警世鐘》等書。這些書，在廣大人民中，特別是對知識分子起了很大的鼓動作用，激勵人們爭先恐後地投身到革命洪流中。

從一九〇三年夏到一九〇五年夏這兩年中，隨著反清革命運動的發展，國內外各地——特別是南中國各省的重要城市中，如湖南、湖北、江蘇、浙江、上海、安徽、福建、江西、四川、陝西等省區，都陸續湧現了不少反清革命小團體，秘密地或公開、半公開地進行活動。這些小團體，人數一般都很少，活動範圍絕大多數局限在本省，有的僅幾縣，互不聯絡，各自為戰，具有明顯的地域性。它們中有的主要從事革命鼓吹，如福州的「益聞社」以設閱報所、

秘密傳佈反清革命書刊等方法「驚醒國人之迷夢」；四川的「公強會」、「公德會」，或在會員中樹立革命思想為目標，或以「保障人權、剷除強暴為社旨」；陝西的「勵學齋」，以廣購書報、勸導有志之士；江西的「易知社」，「明則以詩文結社，暗則進行革命宣傳活動」。這類組織，雖尚不及密謀起義，但開了當地結合社團的先河。有的專以聯絡會黨作為發動起義的預備，如福州的「文明社」、嘉興的「溫台處會館」。前者表面上以閱報社的公開面貌出現，實質上專以聯絡當地各山堂堂魁以圖舉事；後者則以聯絡江浙皖三省交界處的會黨為職志。有的主要在學界發展成員，如安徽的「岳王會」主要成員是安徽公學師生，也有部分武備學堂學生；有的則以聯絡軍界為己任，如南京的「強國會」、安慶的岳王會分會。這些情況表明，當時不少革命小團體的活動大都具有因地因時制宜的性質，缺乏全域觀和較為周密的計劃性。它們雖在各自的活動區域內對傳播革命思想和結集反清力量起過很大作用，但畢竟因地域分散、缺乏聯絡配合而顯得勢孤力單。

在上述眾多的革命小團體中，活動範圍不以省界為局限、組織發動比較深入細緻、反清起義有切實計畫、在辛亥革命史



一九〇四年七月，胡瑛、呂大森在武昌設立科學補習所，從事革命活動。圖為該所負責人胡瑛。

上有較大影響和重要地位的，當推華興會、科學補習所和光復會。

華興會醞釀於一九〇三年十一月，正式成立於一九〇四年二月十二日。它的發起人和會長，是後來與孫中山齊名，世以「孫黃」並稱的湖南善化人黃興；副會長是衡山劉揆一（霖生）、桃源宋教仁（鈍初）。黃興原名軫，字杞園，從事秘密革命後改名興，字克強，一字厘午、慶午。一八七四年十月二十五日生於善化一戶塾師之家。一八九六年中秀才，後來又就讀於武昌兩湖書院。他最初仰慕的是譚嗣同和唐才常。一九〇二年以湖北官費留學日本進弘文學院速成師範科後，開始表現出革命的積極性。當年，他參與創辦《遊學譯編》，又贊助湖北人劉成禺等創辦《湖北學生界》。一九〇三年參加拒俄義勇隊和軍國民教育會，不久又秘密加入以暗殺為宗旨的團體，並且練得一手好槍法。一九〇三年六月畢業，以軍國民教育會「自認特派員」身分回國，從事秘密革命活動。

華興會是當時留日學生中最重要的革命團體，也是當時國內除興中會外最有影響的革命團體。但是，它沒有留下任何政治檔，宗旨至今不清，只知道它在籌畫長沙起義時曾提出過「驅除韃虜，復興中華」的口號。

科學補習所是湖北省一批革命知識分子運動軍隊的組織，發起人是呂大森、張難先，成立於一九〇四年七月，所址設在武昌多寶寺街，後遷至武昌魏家巷一號。

湖北的革命志士早在一九〇二年起就注意在新軍中進行工作，方法是將傾向革命的學生和士子利用黨人吳祿貞擔任軍界要職的機會，派入軍隊，對新軍士兵進行革命思想的灌輸。同

時，又在武昌花園山設立秘密機關，使學堂和軍隊中的志士得以經常聚會。到一九〇三年上半年，湖北新軍中聚集了不少新型知識分子和革命志士，其中著名的有張難先、朱元成、陳從新、雷天壯、陳教懋、毛復旦、李勝美、劉靜庵以及由湖南轉入湖北的華興會會員胡瑛等人；學界中有呂大森、馮特民、李亞東、范騰霄、歐陽瑞驊、曹亞伯、朱和中、賀子才、史青等。軍、學兩界的工作初見成效之後，於是有發起組織之議。科學補習所正式成立時，公舉武備學堂學生呂大森為所長，華興會會員、新軍第八鎮工程營士兵胡瑛為總幹事，由兩湖書院學生曹亞伯任宣傳，文普通學堂學生、華興會會員宋教仁任文書，康建唐任庶務，並在軍隊與學堂中分設幹事，以「革命排滿」為宗旨。

光復會的成立比較複雜。先是一八九七年由章太炎等在杭州發起成立「興浙會」。其性質，與當時維新思潮盛行時期各地學會「名實或少異」，強調要以復興浙江「用武」傳統作為復興中國、復興亞洲的第一步。所謂「用武」傳統，指的是黃宗羲、張煌言的反清鬥爭傳統，所以「興浙會」是一個隱含著反清意義的政治團體。

在光復會成立前，浙江志士正在對會黨進行秘密聯絡和發動工作。這一工作，實際上有兩條線並肩進行。一條是以陶成章、魏蘭、孫翼中等留日學生組成，目的是為了在浙江建立一個能利用會黨的革命團體；一條是以敖嘉熊為首的當地革命志士，目的在使會黨組成一支反清的軍事武裝。兩條線並行發展，未能結合，但有聯繫，居間聯絡者主要是陶成章。他雖已擬有組織革命協會以統一全省會黨的計畫，但結果未能實現。隨著客觀革命形勢的發展，浙

江需要一個領導革命的核心組織，通過它，把全省志士和分散的會黨組織起來。於是，光復會在一九〇四年十月間在上海正式成立。

光復會又名復古會。光復一詞

的含義，章太炎在《革命軍·序》中早有解釋：「抑吾聞之，同族相代，謂之革命；異族攘竊，謂之滅亡；改制同族，謂之革命；驅除異族，謂之光復。今中國既滅亡於逆胡，所當謀者，光復也，非革命云爾。」復古一詞的意義，至今未見到當時人的解釋，但若聯繫到光復一詞的原義，則它要復的古，應該是漢族的文化制度似無疑問。所以，它的入會誓詞規定為：「光復漢族，還我山河，以身許國，功成身退」。

光復會最初選擇會員極為嚴格，會內制度也很嚴謹。會員彼此都不相識，只有在共同參加多次會議和秘密工作之後，才知道對方是自己同志。會員入會時，必須舉行秘密的入會儀式，入會者要歃血和對天發誓表示革命決心。據說，會員以金牌為徽章，中鏤一「復」字篆文，旁刻楷書。

截至同盟會成立前，光復會的會務發展較為集中於浙江、江蘇和安徽三省，它成了與興



一九〇四年十一月，蔡元培等在上海創立革命團體光復會。圖為會長蔡元培。

中會、華興會三足鼎立的國內重要的革命團體了。但是，由於活動分散，難以採取一致的步調。

三、聯繫知識界

同盟會成立前，孫中山怎樣看待讀書人的？他與國內知識界的關係究竟如何？

首先，孫中山自己就是一位讀書人，在檀香山、香港等地受過系統的西式教育，又努力學習中國文史，一生酷愛書籍。在其早期的幾篇著述中，已經把教育和讀書人與國家的興衰存亡直接聯繫起來考察。他認為，中國「不識丁者十有七八，婦女識字者百中無一」，因而「雖多置鐵甲，廣購軍裝，亦莫能強也！」主張廣設學校，「使天下無不學之人，無不學之地」。他批評時人徒羨歐美諸國多善政，強調泰西國強民富的根本原因，在於「其國多士人」。²⁶這種認識後來體現到興中會的組織原則中去。該會章程規定：本會幹部必須是「品學兼優，才能通達者」。其領導者和骨幹主要是知識人。像楊衢雲等人的輔仁文社，本來就是一個新學人士的組織。特別是史堅如這樣出身正途的少年英俊投身革命，令日本人士群相推重，給孫中山留下深刻印象。他與朱和中等人爭論時，即「列述史堅如、陸皓東諸人之學問以證之」。

其次，孫中山很早就把聯絡知識界作為興中會的組織方針。該會成立之初，便主張「聯

26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第二頁。

結四方賢才志士」，²⁷還主動提出與維新派合作，共謀大業。廣州起義前，孫中山拜訪日本駐香港領事中川恒次郎，聲稱將以康有為、吳瀚濤、曾廣銓等人為統領，²⁸至少有借重其聲名之意。起義失敗後，孫中山流亡海外，從一八九八年起，與為數不多的留日學生建立聯繫，促使其不少反清革命。他總結歷史經驗，特別是太平天國失敗的教訓，認為：「歷朝成功，謀士功業在戰士之上。讀書人不贊成，雖太平天國奄有中國大半，終亡於曾國藩等儒生之領兵。」；「士大夫以為然，中國革命成矣。」²⁹一九〇〇年尤列到日本，和孫中山「議定革命進行兩種計畫，一聯絡學界，一開導華僑」。³⁰此後孫中山努力貫徹這一方針。一九〇二年，他以「中國士大夫尚無組織」，邀集李書城、程家檉、馮自由等人開會於東京竹枝園飯店，要求他們分別對本省學生進行發動聯絡，並稱這次聚會為「中國開天大會」。³¹這說明孫中山非但沒有輕視讀書人，相反清醒地認識到新知識群體在近代革命中的地位與作用。而重視開通士人，又表明其致力的事業不同於歷史上的改朝換代。

當然，孫中山爭取知識人的努力，也有局限。一八九九年以前，他主要致力於武力反清，

27 《香港興中會章程》，《孫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第二十二頁。

28 《原敬關係文書》第二卷，書翰篇，日本放送出版協會一九八四年版，第三百九十二頁。

29 劉成禹：《先總理舊德錄》，《國史館館刊》創刊號，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30 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第三十一頁。

31 劉成禹：《先總理舊德錄》，《國史館館刊》創刊號，一九四七年十二月。

對宣傳和組織工作重視不夠，因而活動重心偏向會黨。就早期新學界的政治小團體而言，與會黨結合才能更快地進入武力反清軌道，華興會、光復會同樣如此。華興會入會者雖達五百人，因為多數是知識人士和青年學生，還是要依靠會黨發動起義。光復會初期，會員「大部分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顧慮動搖，行動不堅決」，也將「注意力集中到運動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會黨方面，動員參加，以達到武裝革命的目的」。³²而另一些革命小團體，因未與會黨聯合，活動就只能停留在宣傳方面。革命黨人對此深有感觸，他們說：「會黨黨羽眾多，又能脫離政府，超然自有所建樹，隱然為一國之潛勢力不可誣也。數年以來，愛國志士倡僕滿獨立之議，而赤手空拳，無所憑藉，不足當偽政府劍頭之一映，則折而屬意於會黨，思有以運動而聯絡之。」³³知識界本身的狀況以及孫中山具有的條件也制約其努力的效果。庚子以前，國內知識界接受排滿革命主張者的確不多。如章太炎所說：「方今支那人土日益闖茸，背棄同族，願為奴隸，言保皇者十得八九，言復漢者十無二三。」³⁴而孫中山自一八九五年廣州起義失敗後就成為清廷緝捕的「欽犯」，與國內聯繫十分困難，更難以踏足國土。一九〇三年後，隨著新知識群的革命化，孫中山與國內知識界的聯繫大大加強，而後者

32 沈殿民：《記光復會二三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四集，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三十四頁。

33 《會黨之進步》，《復報》第六期，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34 《來書》，《中國旬報》第十九期，一九〇〇年八月九日。

的活動和作用仍集中於宣傳方面。孫中山認為讀書人不宜作為武裝起義的主力去衝鋒陷陣，的確反映了知識界的實情。他與朱和中等人爭論的問題之一，正是知識分子在武裝鬥爭中的作用。不過，即使在這方面，孫也沒有輕視讀書人的作為。他認為會黨固然重要，但「必其聯合留學，歸國之後，於全國之秘密結社有以操縱之，義旗一起，大地皆應，旬日之間，可以唾手而摧虜廷」，³⁵

從一八九八年起，孫中山鑒於廣州起義失敗後，清朝地方官防範嚴密，以廣東作為起義的發難之地，「今日非善矣」，考慮把戰略重點轉向長江流域，但又感到「萬端仍以聚人為第一著」，³⁶這方面對長江流域沒有把握。於是，他一面立足廣東，一面努力擴展活動範圍，為此採取了兩項重大措施：第一，指示陳少白到香港創辦《中國日報》，加強宣傳，發動國內知識界。第二，派人聯絡湘鄂閩粵會黨，組織興漢會，又與梁啟超商議聯合組黨，一致反清。不料後一方面努力的結果多半是為他人作嫁衣裳，從此直到同盟會成立，孫中山沒有再度大規模聯絡國內會黨，而把主要精力放到與保皇會爭奪華僑和留學界之上。他對於宣傳組織工作較前重視，並得到在士林中頗負時名的章太炎等人的支持聲援。一九〇〇年章氏因主張嚴拒滿蒙人入國會，不為同人見納，憤然斷髮出會，以示與保皇派決絕，隨即將所撰《請嚴拒滿蒙人入國會狀》、《解髮辯說》投寄《中國日報》，引興中會為同志。以後又在《國民報》

35 宋教仁：《程家樞革命大事略》，《國史館館刊》第一卷第三號，一九四八年八月。主張用留學生統帥和指揮會黨。

36 《與宮崎寅藏等筆談》，《孫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第一百八十三—一百八十四頁。

上發表《正仇滿論》，公開與保皇派論戰。同盟會成立前，章太炎等人的革命宣傳對孫中山的活動很有幫助，「影響所及，就地域言，由上海擴及長江流域；以物件言，由下層階級，普遍到知識階級，這於後來革命成功關係是很大的」。³⁷與知識界的革命化相適應，孫中山不僅思想上而且行動上越來越重視聯絡知識分子，並逐漸形成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組建革命大團體的計畫。

同盟會成立前，孫中山爭取知識界的重點是留學生，同時通過各種管道，特別是留日歸國學生和一些往返於海內外的革命人士，與國內一些重要省區的知識界建立了不同程度的聯繫。

孫中山與國內知識界的聯繫集中在江浙、湖北、廣東三個重要地區。以上海為中心的江浙一帶，有近代中國經濟文化最為發達的優勢，成為進步知識人士的薈萃之所和國內學界風潮的發源繁盛之地；湖北省垣武漢號稱「東方芝加哥」，洋務新政力開風氣之先，興學留學均躋於全國前列，進步知識界的組織與生活持續活躍；廣東則為近代維新與革命運動的發祥地，開放既久，人心思變。由於上述三地新知識界的實力較強，與之聯繫，既可以反映國內知識界的基本動向，又足以影響全國局勢。

孫中山與江浙知識界的聯繫發端甚早。一八九八年初，赴日考察報務的汪康年等人就和他有過接觸。在日期間，孫中山結識了不少留學生中的英俊之士以及章太炎等著名新學士紳，

許多人歸國後就在上海開展活動，如章太炎、張繼、馬君武等人參加中國教育會，創辦愛國學社，為《蘇報》撰述；秦力山、戡元丞等開辦《大陸》雜誌、《少年中國報》，辦新譯社；葉瀾等組織東亞談話會等，彼此聯繫日見緊密。尤其是孫中山與中國教育會的關係，值得重視。「《蘇報》案」後，中國教育會會長黃宗仰亡走日本，孫中山特邀其同居一樓，兩人情誼甚篤。黃宗仰以「仰瞻星斗十年久，蒞漢聲聞三度雷」³⁸的詩句，表達對孫中山的久慕之情。此後，孫中山與其保持通信往來，還通過黃宗仰與上海革命黨人聯繫。鄒容的《革命軍》刊行於滬，「是時禁網方密，除鏡今書局外，無人敢為出售，乃由黃宗仰寄千冊予先生（即孫中山）。嗣先生來函，稱《革命軍》為南洋所崇拜」，³⁹汪德淵為中國教育會會員。這對宣傳能力不敵保皇派的興中會幫助極大。孫中山覆函請求繼續予以臂助，「務望在滬同志，亦遙作聲援，如有新書新報，務要設法多寄往美洲及檀香山分售，使人人知所適從，並當竭力大擊保皇毒焰於各地也」。⁴⁰鼓動以中國教育會為中心的國內進步知識界加入反對保皇派的鬥爭。張繼甚至稱：「『《蘇報》案』未決之先，余時至巡捕房探問，太炎致書總理，稱『總統鈞鑒』，交余設法轉遞。」⁴¹一九〇三年秋，中國教育會內部發生糾紛，大起爭執，多方調解無效，興

38 中央：《與中山夜登冠嶽峰》，《江蘇》第九、十期合刊，一九〇四年三月十七日。

39 《汪德淵致孫中山函》，轉引自杜呈祥：《鄒容的思想演變及其在中國現代革命史上之地位》，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編印：《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冊，臺北，一九六二年版，第五百八十五頁。

40 《覆黃宗仰函》，《孫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第二百三十頁。

41 張繼：《回憶錄》，《國史館館刊》第一卷第二號，一九四八年。

中會機關報《中國日報》社長陳少白聞訊，「以同黨內哄，有礙大局，特親至上海設法和解，並設宴邀集滬上諸同志聯絡感情」⁴²，終於平息了風波。是年底，孫中山又致函上海同志，講述平均地權思想及其與保皇派鬥爭的情況。值得注意的是，他把所定的新誓詞和宣誓方法詳告上海方面，說：「公等既為同志，自可不拘形式，但其餘有志者，願協力相助，即請以此形式收為吾黨。」可見這已不是組織外部的一般關係了。一九〇四年四月二十六日，《警鐘日報》將此函全文刊登，以為號召。六月十日，孫中山在另一致黃宗仰函中詢問：「上海同志近來境況、志氣如何？」⁴³除黃宗仰、章炳麟外，教育會與孫中山有過交往或通信聯繫的還有幹事王慕陶、戢元丞、會員張繼、馬君武等。雙方在掃蕩保皇派方面的配合協作，幾近統一組織的共同行動，所以孫中山、陳少白稱上海方面為「同黨」或「同志」。

湖北方面，庚子自立軍起義時，孫中山與湖北知識界的關係一度密切，以後雙方的聯繫通過兩條管道保持和擴展，一是湖北留日學生，如吳祿貞、劉成禺、李書城、戢元丞等。另外，程家樅、沈翔雲等祖籍不是湖北，而與湖北學界關係密切。吳祿貞等人回國後，與武昌新學界中的激進分子共組花園山機關，儼然成為當地進歩知識界的領袖。結會者籌議運動方法，其中一條是「尋孫逸仙，期與一致」。

孫中山與湖北知識界聯繫的另一管道，是旅居上海的鄂籍人士。花園山機關成立後，「公

42 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第一百三十六頁。

43 《覆黃宗仰函》，《孫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一年版，第二百四十一頁。

開招待各處來訪之志士。於是遠自東京，近至上海，莫不互通聲氣」。⁴⁴還派人到上海設立聯絡處。當時活動於上海的各省進步人士很多，為了便於聯繫，增強影響，建立了一些地緣性小團體，如福建學生會，參加者不限於學生，還包括教員、編輯、記者和郵政、路礦、船政等部門的職員。湖北在滬同人也有類似機構，即國民叢書社。該社「為王君（慕陶）所創立，為吾湖北學生公益起見，遞書售報，同鄉公舉以為上海機關，於吾湖北關係甚大」。⁴⁵武昌花園山機關派赴上海創辦聯絡處昌明公司的萬聲揚，就與國民叢書社有直接關係。該社實際上成為湖北知識界與國內外志士溝通的聯絡機關，不僅劉成禺、戢元丞與之關係密切，孫中山本人還與該社負責人王慕陶有通信往來。

廣東是孫中山的故鄉，也是他最早進行政治活動並長期重視之地，他與廣東進步知識界的關係之緊密，不言而喻，興中會就吸收了一批優秀的廣東新學之士。孫中山在日本期間，積極贊助留日粵生組織廣東獨立協會，創辦《開智錄》。興中會還在香港開辦了兩家報紙，直接對廣東新學界進行宣傳，一是陳少白主持的《中國日報》，一是鄭貫一主持的《廣東日報》。他們十分關注廣東學界動向，特別是對一九〇三年興起的學堂風潮，大加報導評論，推動運動在粵省的發展。因此不少學生以二報為自己的輿論喉舌，寄文投稿，通過報紙向社會吐露

44 朱和申：《歐洲同盟會紀實》，《辛亥革命回憶錄》第六集，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三頁。

45 《湖北在滬學生代王劉二君公告》，《大陸》第十二號，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另據《湖北學生界》第三期《湖北同鄉會敬告》：「宜昌王君慕陶寓居上海新聞新馬路餘慶里十九號國民叢書社，願以所寓作湖北同鄉招待處。」

心聲。不過，由於革命派和保皇派都以廣東知識界為力爭對象，清政府特別注意這一地區新知識界的動向，甚至有因為害怕孫中山的影響計畫蔓延而主張廢棄新學及學堂教育者。⁴⁶對於興中會的活動，更是嚴加防範。加上廣東知識界缺乏組織，保皇會的影響又多所掣肘，孫中山與之聯繫難以進一步發展。

除上述三地外，湖南、福建兩省知識人與孫中山的關係也值得注意。兩湖社會聯繫密切，孫中山與湖北知識界的交往，勢必輻射到湖南。同時，上海的湘籍進步人士秦力山、章士釗等與孫中山有著直接間接關係，秦力山還被認為是「宗旨惟在革命」的「孫黨」。⁴⁷他們在向國內知識界宣傳孫中山方面起過積極作用，又與原籍進步人士保持緊密聯繫。一九〇三年底從東京歸國到長沙任教、加入華興會的翁浩、鄭憲成，是孫中山所創東京青山軍校成員，曾由孫親自主持宣誓，對其革命主張有比較全面的瞭解。此外，華興會會員中，張繼、葉瀾等見過孫中山，蘇子毅則到過《中國日報》社。他們均對湖南知識界有所影響。趙聲在《保國歌》中唱道：「新湖南與新廣東，社會秘密通消息。」⁴⁸雖然受歐榘甲、楊毓麟鼓吹湘、粵獨立的同名作品的影響，所指顯然不是保皇的康、梁，而是興中會、華興會這類反清團體。兩湖和江寧學生將這份傳單在長江流域廣為散發，華興會也以此為重要宣傳品。儘管這些聯繫帶有

46 《兩廣總督陶制軍批斥洪牧嘉與札稿》，《選報》第九期，一九〇二年三月十日。

47 一九〇二年三月十八日《致吳君遂等書》，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版，第一百六十三頁。

48 《在湖南革命之氣運》，《中國日報》，一九〇四年四月十一日。

間接性，畢竟不像有些學者所說，自從畢永年隱跡後，孫中山失去了他和湖南、湖北兩省的唯一聯繫；直到五年後結識黃興，與兩湖的聯繫才得以恢復。⁴⁹

一九〇三年，福建進步人士「聞國父倡義嶺南，豪俊風從，遂在滬組織福建學生會」。⁵⁰該會與中國教育會關係很深，不少會員同時加入兩個組織，如林獬、林宗素兄妹，既是中國教育會會員，參加編輯《中國白話報》、《警鐘日報》，又是福建學生會的骨幹。青山軍校的翁浩、鄭憲成（均為閩籍）歸國途經上海時，也參與該會活動。當時湘閩兩省的新學界，尤其是青年學生運動十分活躍，孫中山與之接觸聯繫，很有積極意義。以後湖南進步知識界中不少人成為同盟會的骨幹，福建學生會也加入了同盟會。

綜上所述，孫中山從開始革命活動之日起，就重視讀書人的地位和作用，隨著知識界革命傾向的增強以及聯合會黨、聯合維新派嘗試的屢次受挫，其倚重態度日益明顯，行動也日趨積極。一九〇三年以後，通過各種管道媒介，孫中山與國內知識界建立起直接或間接的聯繫，國內知識分子普遍加深了對孫中山的認識。結果，孫中山在國內知識界的聲望影響不斷增長，成為革命分子的公認代表。雙方共識增多，互信接納程度加強，為同盟會的成立及革命形勢的發展創造了條件。從此，「秀才造反」在中國有了嶄新的含義，一個由讀書人扮演主角的新

49 薛君度：《黃興與中國革命》，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版，第四十一頁。書注明此意出自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的《畢永年削髮記》，但馮著原話為：「自庚子至乙巳同盟會成立。長江流域各省之運動一時為之停頓云。」

50 《林森事略》，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印：《革命先烈先進傳》，臺北一九六五年版，第八百一十三頁。

紀元拉開序幕。

四、「華僑為革命之母」

千百萬海外華僑，都是中華民族的子孫。他們中的大多數是在國內封建統治階級殘酷剝削壓迫下，為了求生，被迫漂洋過海的。有的是被外國侵略者勾結本國惡勢力拐騙和綁架到國外充當契約勞工，也有的是為了逃避國內的政治迫害而不得不逃亡海外。原因種種，但都是無可奈何地拋妻別子、流落異國他鄉的。他們主要分佈在南洋一帶，即印尼、泰國、馬來西亞、越南、緬甸、菲律賓等國。歐洲、非洲的數量很少，但美洲和大洋洲卻很多。據統計，在一九〇七年時，華僑總人數約六七百萬人。他們漂泊重洋到了海外，曾對居住國的開發和經濟建設做過重要貢獻。但不少居住國政府和殖民統治當局出於政治和其他需要，對華僑進行了肆無忌憚的迫害，各地排華乃至屠華事件時有發生。清政府對華僑不但不予保護，而且歧視、指責，把他們視為「自棄王化」的莠民。鴉片戰爭後，中國一步步淪為半殖民地，華僑在海外更受輕侮。因此，廣大華僑痛恨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迫切希望國家強盛起來，有一個良好政府保護他們的應有權利和人身安全。正是這種強烈的愛國感情和救國願望，推動了他們中的一批先進分子積極支持和參加孫中山領導的反清鬥爭。

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事業，首先是從海外華僑中開始的。孫中山的家鄉是僑鄉，他本人出身於華僑家庭，他的兩個叔父早年隨華工的人流到美國謀生；其兄孫眉是檀香山僑商。

從某種意義上說，孫中山既是一位民主革命的領袖，又是一位華僑革命的領袖，是華僑的貼心人。在他領導的辛亥革命中，把華僑作為革命的動力之一，而華僑也把他視為救星和知己。因此在革命中華僑和孫中山結下了生死與共的情誼。

孫中山進行革命活動一開始，就得到其兄華僑農牧資本家孫眉的大力支持；興中會成立後，又成為孫中山革命的重要資助者。據統計，辛亥革命前，孫眉慷慨資助孫中山的革命經費總數約達七十五萬美金，可見數量之大。在廣大的下層華僑中支持孫中山革命的更有許多生動感人的事例。如越南堤岸華僑關唐是一名挑水的傭工，為人家挑一擔水，只得一文錢，但他有一次將一生挑水積蓄的三千多元，全部捐給孫中山，表現了華僑工人無私的報國精神。

從一八九四年孫中山在檀香山創建興中會以來，興中會一直是他發動反清起義的組織中心，華僑作為各地興中會組織的基本成員，為革命做出了重要貢獻。但興中會在發展過程中暴露了不少缺陷，華僑也在革命與保皇勢力的鬥爭中表現出彷徨與困惑。一部興中會組織史，既反映出革命派在組織建設方面的認識水準，也顯示出華僑的政治覺醒程度。在惠州起義失敗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困擾孫中山的是如何整頓他親手創建的興中會組織。而要整頓興中會，就勢必要在華僑中加強革命思想的宣傳。

華僑散居世界各地，他們的年齡、經歷、職業各別。各地的政治環境也不一樣，因此不同地區和不同的人的心境和政治態度也有別。在有清一代，充當「苦力」的華僑占華僑中的大多數，他們屬於華僑社會的下層。這一部分華僑一向期望祖國能夠獨立、繁榮和富強，作

為他們堅強的後盾，支持他們擺脫苦境，他們積極支持孫中山的反清革命。有一部分華僑，尤其是一些富商，或屬上層社會的人，由於他們同國內的封建統治者和國外的殖民主義者，以及和所在國的統治集團有諸多的關係，政治態度稍微保守，他們對孫中山的反清革命態度較為冷淡。所以，華僑對孫中山革命的態度只是就它的大多數，就它的主體方面來說的，不是說它的全體。

在孫中山近四十年的革命鬥爭史上，「無不有華僑二字」。正因為這樣，孫中山高度評價華僑對中國革命的貢獻。他說：華僑「熱誠愛國，贊助獨先」，或「犧牲頭顱，或贊助軍實」，「華僑為革命之母」，「每次起革命都是得海外同志的力量」，「華僑不自言功者，蓋知救國為真天職，不事矜舉」。

孫中山為了反清革命，他的足跡由亞洲而美洲，又由美洲而歐洲而亞洲。他所到之處都深入華僑社會，關懷他們的生活，開導華僑關心國家大事，號召華僑出錢出力，贊助革命；保護華僑的利益，盡力解除華僑的苦境。他四處奔走於華僑居住地區，不辭辛勞地鼓勵華僑勤奮創業，宣傳愛國愛鄉，動員華僑投身排滿革命。孫中山與華僑心脈相系，骨肉情深，並在華僑中具有崇高的威望，為全球華僑所共仰。孫中山領導的革命的勝利，是與華僑的大力支持分不開的。

不過，從各方面的情況看，當時華僑上層比較保守，對孫中山反清革命所持的態度十分謹慎，多數都是持觀望的態度。對孫中山反清革命做出重大貢獻者，嚴格說來是華僑中的知

識分子和屬於中下層的工商業者，及其他勞動大眾。

孫中山為爭取美洲致公堂華僑支持革命，對其做了大量工作，並且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促使致公堂中一些進步華僑，對孫中山的革命活動給予滿腔熱情的支持。如一九〇四年三月底孫中山赴美國舊金山，當地保皇派分子及清領事互相串通並勾結美國海關之事，以孫中山所持護照為偽照，將其扣留在碼頭的木屋中，並擬駁回檀島。後經當地美洲致公堂總部領導人多方設法，大力營救，才使被關木屋十七天的孫中山脫難。

愛國華僑對孫中山革命事業的支援，除去參加興中會組織外，突出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為革命捐款助餉，甚至毀家紓難，表現了極大的愛國熱忱。據現有材料統計，一八九四—一九〇〇年間，華僑捐助革命經費共三萬二千美元又五百港元。總額雖不是很大，但捐款者大多是工農勞動階層和中小商人，積貨不多，這三萬餘美元，包含了他們辛勤勞動所得的血汗。有的甚至傾家相助，如檀香山華僑鄧松盛（即鄧蔭南），為支持孫中山發動第一次反清起義，便盡賣其商店農場，表示「一去不復返之決心」。所以，他們對中國革命的資助，體現了海外赤子的一腔熱忱。在革命初起、經費艱難的情況下，對孫中山的革命事業無異是「雪中送炭」，其意義是無可限量的。當然，這一階段中華僑捐款總數不大，還包含著康梁保皇會對華僑蠱惑的客觀因素在內。由於保皇會的欺騙，一九〇〇年唐才常自立軍勤王時，康有為在南洋、美洲華僑中募得百萬元以上的鉅款，其中富商邱菽園一人就捐了二十萬元，檀香山華僑也捐款「逾華銀十萬元」，致使革命派同年發動的惠州起義，未得檀香山華僑的資助。

二是積極參加革命鬥爭。從愛國思鄉發展到投身革命行列，這是華僑政治覺醒的軌跡。雖然，一九〇〇年前後廣大華僑的革命覺醒整體上還未到來，但其中的一些先進者就已開始投身反清起義隊伍。一八九五年廣州起義時，華僑參加起義的有鄧蔭南、宋居仁（廣東花縣人，一八九四年加入檀香山興中會）、侯艾泉、夏百子等，其中不少是工人；一九〇〇年惠州起義時，鄧蔭南、宋居仁、盧文泉等華僑也參加了起義軍。

除上述兩個主要方面外，愛國華僑在革命思潮影響下，集資辦報、宣傳革命，也是一個必須強調的貢獻。這一點，在興中會時代雖然因華僑整體上的政治覺醒尚未到來而並不普遍，但南洋地區的華僑因地緣關係可得風氣之先，所以仍有突出的表現，其代表人物就是新加坡華僑陳楚楠。他在南洋創辦了《圖南日報》，銷售量達兩千多份，終於撐起了南洋革命宣傳的半壁江山。

孫中山在組織興中會及發動反清起義革命過程中，從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源源不斷地得到了廣大華僑的支持。從一定意義上說，沒有華僑就沒有興中會，也就沒有孫中山的革命事業。

五、中國同盟會的成立

形勢的發展，要求人們迅速將各地分散的革命力量聯合起來，建立一個全國性的統一的革命組織，以迎接全國大規模革命運動的早日到來。聯合，已成為革命形勢發展到這一階段

的必然要求；團結，是當時每一個愛國者的共同願望。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在二十世紀初年的明顯發展，也為這種全國性資產階級革命組織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階級基礎和物質條件。

孫中山正是從革命形勢的發展、革命知識分子作用明顯加強中，受到莫大的鼓舞。早在一九〇三年七月，他從越南回到日本後，就增多了同新興的知識階層的接觸，開始加強重視和注意團結知識分子，在留日學生中開展工作，支持其中的激進分子從事革命活動。他在橫濱的住處山下町寓廬，經常有留學生出出進進，其中以軍國民教育會的積極分子為多。孫中山和他們促膝談心，暢論革命救國的道理和方法，並從中物色人才。這是孫中山革命歷程的一個重大變化。過去，他主要是從「聯絡會黨入手」，進行革命活動，此後，除繼續從事會黨工作外，把活動的重點開始轉向日益覺悟起來的知識分子，並著手用大的力量去聯絡、發動和組織這支突起的新軍。當時，一些留學生經拒俄愛國運動後有學習軍事的要求，孫中山便在東京青山練兵場附近秘密創辦革命軍事學校，聘請新結識的日本軍事學家日野熊藏為校長，退役軍官小室健次郎為助教，傳授軍事知識及槍炮火藥製造方法，尤其注重布林人（Boer，曾譯作婆爾人，是南非荷蘭人移民的後裔，他們在南非建立了奧倫治、德蘭士瓦兩個共和國。一八九九年至一九〇二年間，英國和布林人進行了為時三年的英布戰爭）的遊擊戰術及以寡戰眾的夜襲法。孫中山為組織反清武裝起義，這時也專心研究軍事，讀了大批關於英布戰史的書籍資料和圖冊，並和日野熊藏共同研討布林人的遊擊戰術，認為這種戰術「最適用於揭竿起事之中國革命」。孫中山規定入學學生（共十四人）必須填寫盟書，表示革命決心，並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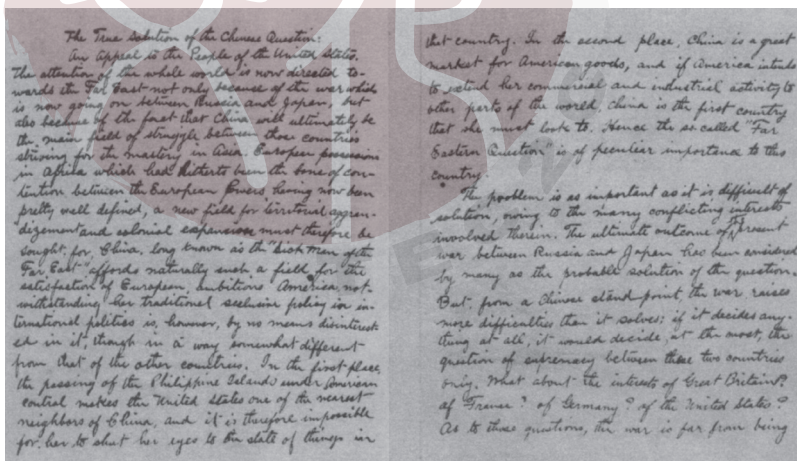
自主持宣誓，誓訓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如有不遵，應受處罰。」這是孫中山第一次用這樣內容的誓詞。誓詞中「平均地權」的提出，標誌著後來定名為民族、民權、民生三民主義的思想內容已經基本具備。同時，還應該看到，這是孫中山把具有愛國革命思想的知識分子，提高到完整的民主主義革命綱領的創舉。從此，這個誓詞就成為孫中山聚集人才和進行革命的行動綱領。不久，孫中山離開日本時，把同留學生的聯繫工作，專門委託給馮自由等人。這所革命軍事學校維持了近半年的時間，因孫中山離日後校內發生糾紛而停辦。

一九〇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孫中山從日本赴檀香山。他自一八九六年離檀，已過八年，當十月五日重抵檀香山後的所見所聞大出意外，竟看到自己親手組織成立的興中會被破壞得面目全非，許多老會員變成了保皇黨的骨幹，興中會的陣地幾盡為保皇黨奪去，痛感保皇黨的危害甚大。他立即一面大力批判保皇黨的謬論，一面著手重建和發展革命組織。建立起來的團體，不再叫興中會，命名為「中華革命軍」，以強化革命意識，其動因是紀念「《蘇報》案」入獄的《革命軍》作者鄒容。規定了入會者都要舉行宣誓，並把「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字正式列入誓詞。參加者在希爐有十餘人，在火奴魯魯有數十人。

與此同時，孫中山還採取發行公債券的方式募款，以供起義的需要。華僑購買頗為踴躍。他還經常為華僑病人義務診治疾病，深得僑胞們的敬仰和信任。當時，檀香山華僑加入致公堂（即洪門，是國內具有革命傳統的天地會的一個支派，在美洲和檀香山華僑中擁有廣大的

成員)者十居六七，為了與保皇黨爭奪群眾，孫中山於一九〇四年一月十一日在火奴魯魯又毅然加入致公堂。致公堂為孫中山舉行了特別「開台戲」(洪門稱招收會員拜盟行禮為演「開台戲」)，歡迎孫中山加入，並封他為「洪棍」之職。「洪棍」，又稱元帥，它和紙扇、草鞋是洪門組織的三種重要職務。洪棍掌刑罰，有人犯罪，可以開堂審判和施加刑罰，地位極高。

在完成興中會整頓任務和初步肅清保皇思想在華僑中的影響後，孫中山於一九〇四年三月三十一日離開檀香山作美洲大陸之行。七月，他在美國紐約時，與中國留學生的接觸也較多。他同留學生王寵惠、薛仙舟、陳錦濤等人時相過從，共同討論後來被稱為三民主義、五權憲法的一整套革命思想，以及革命後有關外交、財政等方面的問題。這時，由於日俄在中國境內鏖戰方酣，全世界注意力集中於遠東。美帝國主義更是野心勃勃，企圖在「門戶開放」的幌子下繼續扶持清政府作為侵略中國的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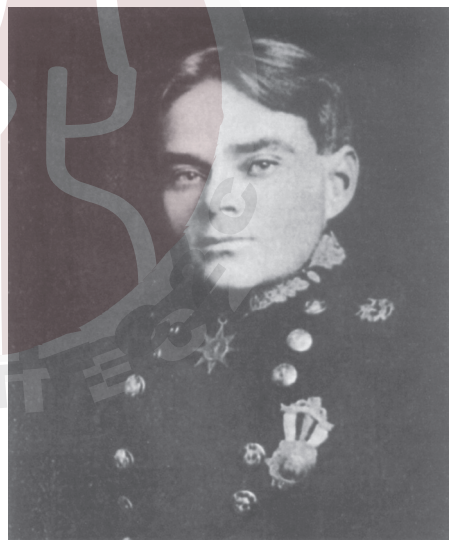
圖為孫中山用英文撰寫了《中國問題的真解決——向美國人民的呼籲》一文的英文原文(局部)。

孫中山便於八月底在聖路易（Saint Louis）城用英文撰寫《中國問題的真解決》⁵¹〈The True Solution of Chinese Question〉一文，向美國人民發出呼籲，要求「在道義上與物質上給以同情和支持」。這是一篇重要的文章，它揭露了帝國主義「爭奪亞洲霸權」的野心，並駁斥了為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服務的反動的「黃禍論」，指出「中國人的本性就是一個勤勞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絕不是好侵略的種族；如果他們確曾進行過戰爭，那只是為了自衛。……如果中國人能夠自主，他們即會證明是世界上最愛好和平的民族」。文中充滿信心地說：「在中國人民中有許多極有教養的能幹人物，他們能夠擔當起組織新政府的任務；把過時的滿清君主政體改變為『中華民國』的計畫，經慎重考慮之後，早就制定出來了。」它還警告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殖民政策只會給自己帶來「危險與災難」，支持清政府也「註定是要失敗的」。文章較為系統地反映了孫中山的革命思想，既有助於民主革命思想的傳播，也促進了世界各國對中國民主革命面貌的認識。與此同時，這篇文章也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孫中山仍對帝國主義抱有幻想。

當孫中山聞知有些學生新從內地或日本到了歐洲，便決定離美赴英作第二次歐洲之遊，積極進行結納志士、組織革命團體的活動。他向中國留歐學主宣傳民主革命思想，闡明要挽救祖國，必須「驅除韃虜」，「創建民國」。

51 以下所錄製引文見《孫中山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五十六—六十四頁。

一九〇四年十二月下旬，孫中山從美國紐約到達倫敦後，一如既往，常到大英博物館閱讀各種書籍，豐富學識，並結識留居英國的吳稚暉等人。這時留歐學生較之一八九六年孫中山第一次到歐洲時確是增加了許多。一九〇四年春湖北、四川等省派出的留學生都到達歐洲，分往比利時、法國和德國入學。在



一九〇四年，孫中山在美國與美國軍事家荷馬李結識，此後，荷馬李追隨孫中山近十年之久。圖為荷馬李照。

革命潮流影響下，他們中的不少人表示贊成或同情革命。翌年春，孫中山應留歐學生史青、朱和中、賀子才等的邀請，離開英國渡海到了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他同當地的中國留學生會見，向他們介紹了自己的革命經歷、政治主張和未來的思想。在會晤中就革命方略和依靠力量等問題有過激烈辯論，曾「反復爭論三日三夜」。在革命的依靠力量問題上，孫中山非常重視這些學生的意見，他開始還認為可以會黨、知識分子雙方並進，在聽取了他們進一步的申述後，擴大了視野，開始轉向以發展學生為骨幹領導會黨的方針，並宣佈今後將在留學生界發展革命力量，「留學生之獻身革命者，分途作領導之人」。這一正確的決策，使留歐學生大為欣悅，他們向孫中山表示：「此吾輩傾心於先生之切願也。」辯論結束的當夜，孫中山即提議大家宣誓，組織革命團體，並親

書不久前青山軍事學校所確定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字綱領為鬥爭目標的誓語。眾人依次宣誓，加入組織者有朱和平、賀子才等三十餘人。由於當時革命團體處於秘密活動的狀態，各成員間須用暗號保持聯絡，必須以暗號相通，才能確定對方身分。所以孫中山在宣誓完畢後，向各人授聯繫暗號：

問：君從何處來？

答：從南方來；

問：向何處去？

答：向北方去；

問：貴友為誰？

答：陸皓東、史堅如二人。⁵²

這個革命組織，當時並沒有定名。它是留歐學生的第一個革命團體，也是孫中山以留學生為物件所建立的第一個組織。

孫中山在布魯塞爾期間，還在五月中旬訪問了設在該地的國際社會黨執行局（第二國際

常設執行機構) 主席王德威爾德 (E. Vandervelde) 和書記處書記胡斯曼 (C. Huysmans), 並且同他們舉行了會談。

在會談中, 孫中山為了向西方尋求革命真理和支持, 曾提出接納他的革命組織為第二國際成員的請求, 試圖與第二國際建立聯繫。據報導, 孫中山「簡要地說明了中國社會主義者的目標。……他們綱領的第一點是驅除篡權的外來人(滿人), 使中國成為中國人的中國。第二點, 要使中國的土地全部或大部公有, 亦即很少或沒有大地主, 土地由公社照章租給農民, ……每人依其財產數量繳納租稅」, 目的在於「防止一個階級剝奪另一個階級的現象, 如像歐洲各國所發生的那樣」。⁵³ 由於第二國際領導人這時越來越深入地陷入修正主義, 他們百般為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辯護, 無視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作用, 所以沒有對孫中山的請求給予熱情的支持。孫中山的這一活動表明他很早就對社會主義充滿了真誠的同情和支持。



一九〇九年春, 孫中山在布魯塞爾與中國留學生合影。

⁵³ 布魯塞爾佛蘭德文《人民報》一九〇五年五月十八日報導。轉引自〔美〕伯納爾 (M. Bernad) : 《一九〇七年以前的中國社會主義》(Chinese Socialism 1907), 美國康奈爾大學一九七六年英文版, 第六十五—六十六頁。

不久，孫中山離開布魯塞爾再往倫敦。同年五月下旬，他自英赴德，到了柏林，向留德學生宣傳民主革命主張，吸收留學生賓步程、王發科等二十餘人加入革命組織。接著，他於六月初又到達法國巴黎，復有留法學生十餘人加盟，組成了革命團體。⁵⁴

孫中山對歐洲留學生抱著殷切的希望，他用了幾個月時間，把留歐學生當中的七八十人都吸收到他所領導的革命隊伍中，使他們形成了一支有組織的革命力量。孫中山把上述的比、德、法三個革命組織的成立視為中國同盟會的起點。在當時，他曾諄諄囑咐加盟者努力向學，以為他日有用之人才，並語重心長地指出：「諸君加入革命矣，仍應努力求學，即返國後，亦可仍為清廷官吏；他日革命軍起，諸君以官吏地位，領導民眾，更易奏效。如諸君學業未畢，而國內革命軍已起事，遇有必要，餘當來電，電到盼即返國，為我臂助也。」⁵⁵一九〇五年夏，孫中山在歐洲瞭解到國內和東京反清革命運動蓬勃發展的情況，決定結束美歐之行前往日本，以便把各種革命力量聯合起來，組織成一個有能力領導全國民主革命運動的大團體。六月十一日，他從法國馬賽乘船東返，途經新加坡、西貢等地，略事停留，於七月十九日再次來到日本橫濱。

54 孫中山在歐洲比、德、法國建立革命組織的名稱，已無可考查。也有說並未正式命名的。據鄧慕韓：《孫先生自述拾遺》（載《建國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中說：「其以前在歐洲各處所收黨員各盟書，均未填有會名，通稱革命黨而已。」

55 劉光謙：《總理在歐洲最初宣導革命之情形》，《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一冊，臺灣一九六三年版，第三百七十九—三百八十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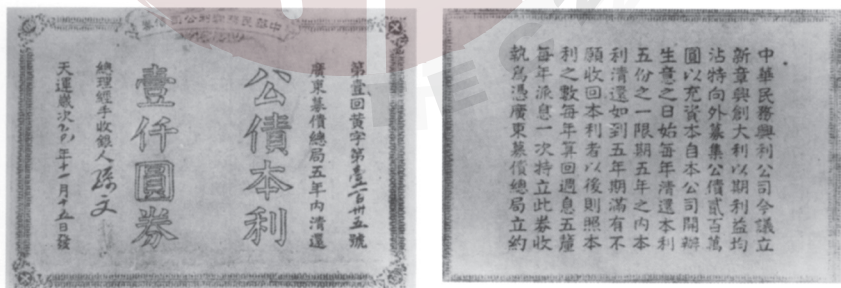
還在孫中山由歐洲來日本前，一些革命青年就以組黨之事相期待。宋教仁在《程家樾革命大事略記》中說：「以同志日漸加多，意欲設立會黨，以為革命之中堅，以謀諸君（按：指程家樾）。君立阻之，謂革命者陰謀也，事務其實，弗惟其名。近得孫文自美洲來書，不久將遊日本。孫文於革命，名已大震，腳跡不能履中國一步。蓋緩時日以俟其來。以設會之名奉之孫文。而吾輩得以歸國，相機起義，事在必成。」這說明孫中山的愛國熱忱和為革命而堅持戰鬥的不屈意志，已在群眾中贏得了極高的威望。這證明，留學界包括流亡日本的革命志士在內，都已深感有建立統一的大團體的必要，迫切希望孫中山早日到來，磋商一切。不到同盟會成立，孫中山已成為大家公認的有威望的革命領袖了。

當時留日學生已增至二千四百人之多，全國除甘肅一省外，各省都有俊秀之士去日本學



一九〇五年春，孫中山到歐洲留學生中開展革命宣傳工作。圖為孫中山與巴黎的中國留學生合影。

習，他們絕大部分薈萃東京，革命熱情非常高漲。恰好前不久，華興會、光復會、科學補習所等革命團體的一些領導和骨幹分子，由於一九〇四年十月間長沙起義計畫的敗露，和十一月間愛國志士萬福華在上海刺殺賣國賊王之春案件的牽連，也先後逃亡到日本東京。在留日學生和革命團體領導人物中，以黃興、宋教仁二人最露頭角。黃興是影響較大的革命團體華興會的領袖，在留學生中也為眾望所孚；宋教仁主辦宣傳反清革命的《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交遊較廣泛。所以，孫中山為了準備「召集同志，合成大團，以圖早日發動」⁵⁶，就立即找黃興、宋教仁等人進行商談。七月下旬，他通過宮崎寅藏的介紹，先前往神樂阪鳳樂園拜訪黃興，暢談革命形勢的發展。孫、黃二人雖是首次會晤，但他們二人在中餐館「鳳樂園」聚談時「既不吃，又不飲，專心談話」，足足兩個小時。最後他們高呼「萬歲！」並舉杯慶祝他們的愉快會晤。共同的革命理想和光明磊落的品格，使他們相見



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孫中山為籌集革命經費，用「中國興利公司」名義發行的債券。

恨晚，立刻成了摯友。

孫、黃在鳳樂園的首次會晤的情節，據宋教仁日記七月二十九日記載：「先是，孫逸仙已晤慶午⁵⁷，欲聯絡湖南團體中人，慶午已應之。」則兩人所談是關於合成大團的問題，即興中會與華興會的聯合問題。黃興對聯合的態度是積極的，會談氣氛十分愉快，無怪最後兩人要舉杯慶賀、高呼萬歲了。鳳樂園會晤，不僅奠定了孫、黃領導的兩個革命團體未來合作的基礎，而且也奠定了中國民主革命時期兩個最偉大的革命家長期合作、攜手共事的基礎。

為了進一步消除合作中可能出現的障礙，又托程家榘函約了宋教仁、陳天華與孫中山晤談。七月二十五日，宋教仁得到程家榘的口頭通知，稱：「孫逸仙已至東京，君可與晤面」，宋教仁當即「允之」。三天後，即七月二十八日，又接程家榘來信，約定該天下午在《二十世紀之支那》社，與孫中山見面。下午一時左右，宋教仁如約，見「孫逸仙與宮崎已先在」，在場的還有陳天華（星台）。這次會晤，據宋教仁日記所記，情況如下：

余既見面，逸仙問此間同志多少，如何？時陳君星台亦在座，余未及回答，星台乃將去歲湖南風潮事稍談一二及辦事之方法，訖。逸仙乃縱談現今大勢及革命方法，大概不外聯絡人才一義，言中國現在不必憂各國之瓜分，但憂自己之內訌，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

57 黃興字慶午。「慶午」乃書寫之同音字。

欲起事，不相聯絡，各自號召，終必成秦末二十餘國之爭，元末朱、陳、張、明之亂，此時各國乘而干涉之，則中國必亡無疑矣，故現今之主義，總以相互聯絡為要。

又言方今兩粵之間，民氣強悍，會黨充斥，與清政府為難者已十餘年，而清兵不能平之，此其破壞之能力已有餘矣，但其間人才太少，無一稍可有為之人以主持之。去歲柳州之役，彼等間關至香港招納人才，時餘在美國而無以應之也。若現在有數十百人者出而聯絡之，主張之，一切破壞之前之建設，破壞之後之建設，種種方面，件件事情，皆有人以任之，一旦發難，立文明之政府，天下事以此定矣（逸仙之言餘尚多，不悉記）。⁵⁸孫中山縱談天下勢及革命方略，暢談到五時，並相約在來日往赤阪區黑龍會繼續會談。

從上述記載中可以看到，孫中山雖長期孤處海外，但他不僅對國內革命形勢的發展有清醒的認識，而且還保持著與國內反清力量之間的聯繫。他從歷史與現實的比較中看出了國內革命形勢發展過程中隱伏著地域主義、分散主義的危險，並從救亡圖存的愛國主義出發，指出了這種「內亂」有可能導致「外患」乘機而入的可怕後果，以此說明革命團體之間的聯合，既為革命事業取得成功所必需，也為避免列強乘機瓜分的上策。這種論斷，不但切合當時國內小團體紛起而互不統一的實情，而且把歷史經驗和中國現實境遇有機地結合了起來。以歷

史經驗說，一個統一的王朝在農民戰爭打擊下，一旦垮臺，就會出現群雄割據的紛爭局面；從現實境遇來說，列強環視，亡我之心不死，內亂就有可能導致外患。這樣，建立一個統一的革命組織，其重要性和必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

七月二十九日，黃興召集在東京的華興會骨幹會議，討論如何與孫中山聯合的問題。原來自鳳樂園孫、黃會晤後，黃興分別徵求過華興會骨幹的意見，同人中有不願與興中會聯合之說，黃興不得不召開會議，「商議對於孫逸仙之問題」。據宋教仁日記所記：

既至，慶午先提議。星台則主以吾團體與之聯合之說；慶午則主形式上入孫逸仙會，而精神上仍存吾團體之說；劉林生則主張不入孫會之說；余則言，既有入會不入會者之別，則當研究將來入會者與不入會者之關係如何。其餘亦各有所說，終莫能定誰是，遂以「個人自由」一言了結而罷。⁵⁹

顯然，會議出現了明顯分歧，最後決定採取「個人自由」即自願的原則。這說明，華興會並不是以集體的名義加入中國同盟會，而是在自願的基礎上，以個人身分加盟的。黃興雖然有「形式上入會」之說，但從加盟後的表現看，他始終保持著全心全意為同盟會服務的精

59 宋教仁：《我之歷史》，《宋教仁集》下冊，湖南桃源三育乙種農校一九二〇年石印本，第五百四十六頁。

神，成了孫中山最親密最重要的助手；劉揆一雖有「不入孫會之說」，但事實上不但參加了同盟會，而且在孫、黃離開總部時曾長期主持總部工作。

華興會是當時國內最重要的革命團體之一，在兩湖，尤其在湖南有較好的基礎。長沙起義儘管在未起之前流產，但華興會的元氣沒有受到大的傷害，它的主要骨幹都先後流亡日本，在日本留學生中仍然是一支活躍的力量。孫中山以華興會作為聯合大團的主要對象進行說服工作並取得了積極成果，證明他不愧是一個富有經驗和富有魅力的革命家。

在此前後，湖北、四川、廣州以及其他一些省的留學生，有李書城、鄧家彥、何天炯等人，也先後拜會了孫中山。他們都擁護組織統一的革命團體的主張。

經過孫中山的積極活動，他提出的建立統一革命組織的意見，得到了在日本的各革命小團體中多數人士的贊同。

根據孫中山原定計劃，七月三十日在赤阪區檜町三番黑龍會的會所召開了被史家稱之為同盟會成立前的預備會議。孫中山率興中會會員梁慕光、馮自由自橫濱蒞會，各省同志之由黃興、宋教仁、程家檉等通知到會者，有張繼、陳天華、田桐、董修武、鄧家彥、吳春暘、康寶忠、朱炳麟、匡一、魯魚、孫元、權道涵、張我華、于德坤諸人。由馮自由通知到會者，有馬君武、何天炯、黎勇錫、胡毅生、朱少穆、劉道一、曹亞伯、蔣尊簋、但燾、時功玖、謝良牧諸人。由胡毅生帶領到會者，有汪精衛、朱大符、李文范、張樹柎、古應芬、金卓、杜之、姚禮修、張樹棠諸人。由宮崎寅藏通知到會者，有內田良平、末永節諸人。共計七十餘人。與會者包

括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科學補習所的部分成員，並有留學生中其他團體的成員和個人參加。除甘肅未派學生留日外，全國內地各省都有人到會。會議推孫中山為主席，孫當場發表演說，申論「革命之理由及革命之形勢與革命之方法」，「詳言全國革命黨各派應合組新團體」以從事反清革命之必要。演說約一個小時，之後，由黃興宣佈今日開會宗旨在於成立組織，請與會者簽名以示正式加入。曹亞伯率先簽名，到會者隨之也都「簽名於一紙」。

接著討論群組織名稱。孫中山提議定名為中國革命同盟會，「時有主張用對滿同盟會名義者，亦有謂本會屬秘密性質，不必明用革命二字者」。孫中山指出「革命宗旨不專在對滿，其最終目的尤在廢除專制，創造共和」，經過討論，決定採用「中國同盟會」的名稱，簡稱「同盟會」。

關於組織的宗旨，孫中山提議採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字為綱領。但有數人對平均地權一節略有疑問，要求取消。孫中山當即作了詳細解釋，論述世界革命趨勢及解決社會民生問題的重要，並說：「平均地權即解決社會問題之第一步方法，吾黨為世界最新之革命黨，應高瞻遠矚，不當專向種族、政治二大問題，必須並將來最大困難之社會問題亦連帶解決之，庶可建設一世界最良善富強之國家。」經解釋後，雖仍有少數人持保留態度，所提出的同盟會宗旨終於獲得會議通過。

在討論中國同盟會領導人時，「黃興倡議公推孫中山先生為本黨總理，不必經選舉手續，眾咸舉手贊成」。其餘則按會章投票選舉。

孫中山是近代中國提倡民主革命的第一人，並為此進行了不懈的鬥爭，在國內外愛國志士中間享有極高的威望，很自然地成為眾望所歸的革命領袖，成為足以團結各方面革命力量的中心人物。

接著，由孫中山擬盟書，經會議公推黃興、陳天華兩人審定，誓詞全如下：

聯盟人□□省□□縣人某某，當天發誓，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失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渝此盟，任眾處罰。天運年月日，中國同盟會會員某某。

然後由各人自書盟誓，由孫中山領導大家同舉右手向天宣誓，行宣誓儀式，明確規定入會的人必須為實行上述十六字宗旨而奮鬥到底；他並至隔壁室傳授同志相見握手暗號和三種秘密口號（一曰漢人；二曰中國事物；三曰天下事）。事畢，孫中山即與各會員一一行新握手禮，並欣然祝賀說：「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最後，會議推定黃興、陳天華、馬君武、宋教仁、



同盟會成立（沈加蔚、陳宜明畫）。

汪精衛等八人組成會章起草小組，約定在成立大會上提交討論。

會議將要結束時，因與會者太多，會場後邊的坐席不負重壓有一木板猝然倒塌，發出轟隆一聲巨響。孫中山目睹此景，應聲笑著對大家幽默地說：「此乃顛覆滿清、革命成功之預兆！」他的風趣和機智，贏得全場一陣熱烈的鼓掌和歡呼。

七月三十日會議的圓滿成功，為中國同盟會的正式成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自七月十九日孫中山到達日本橫濱起，僅僅十天左右的時間，就完成了在日志士的革命聯合，這說明經過民主革命思潮的洗禮，建立統一的革命組織是人心所向，眾望所歸。在這一聯合過程中，孫中山作為聯合之議的首倡者，作為中國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受到眾人的擁戴和推崇，從而確立了他在中國民主革命派中的領袖地位；他的名字，從此真正地超越自然、狹隘的興中會小團體而成了中國民主革命派的象徵。宮崎寅藏和程家榘，在聯合過程中居間聯絡、搭橋牽線，功不可沒；而以黃興為首的原華興會在日骨幹，顯然是促成聯合順利實現的主要力量，這就使他們在同盟會這一大聯合團體中處於重要地位。後來，黃興、宋教仁、劉揆一等成了同盟會東京總部的主要領導人員，除了他們自身的才能外，與他們在聯合過程中做出的貢獻，不是沒有關係的。事實上，黃興在這次預備會議上已經被公認為僅次於孫中山的第二號人物，而孫中山也已把他看作有號召力的領袖。從此，孫、黃並稱的時代開始了。

七月三十日會議之後，程家榘、黃興、宋教仁、張繼、田桐等積極籌備召開留日學生歡迎孫中山的大會。宋教仁尤為出力。八月七日上午九時許，他去程家榘寓所晤孫中山，約定

當晚六時與諸同志在山口方同孫相會。為此，整個下午他接連去魯文卿、高劍公、彭蔭雲寓所通知。當夜七時許又到黃興寓所，坐到九時許始回。九日下午，他先到程家樾寓所，「談良久」，至三時許，又與田桐、張步青同去富士見樓，為歡迎孫中山大會租房間。結果沒有租到，他就將此事委託田桐處理。十一日，田桐報告說：富士見樓房間已經租得，定於八月十三日下午一時至六時開會。宋即囑田桐「書郵片發各處」，自己則到中國留學生會館張貼會議通知。下午四點鐘，又到黃興寓所彙報一切。十三日歡迎會召開當天的中午十一時，宋教仁先到富士見樓，「經理開會一切事宜畢」，十二時整至櫻亭，囑孫逸仙「早至會場」，自己則再到富士見樓做會前檢查。宋教仁的上述活動表明，這次留日學界歡迎孫中山的大會，是在原華興會在日誌士的努力下進行籌備的，黃興居中指揮，而宋教仁則承擔了類似會議秘書長的角色。這一情況既說明了華興會在革命大聯合中的重要地位，又顯示了孫、黃合作的誠意。

八月十三日下午一時，留日學生歡迎孫中山大會準時在東京麴町區飯田河的富士見樓舉行。這是孫中山首次在盛大的留學生集會上公開露面，也是同盟會正式成立前夕，由它的領袖向廣大群眾宣佈其政見的重要政治活動，因而吸引了許許多多的留日學生。八月的東京，天氣十分炎熱，人坐著不動也汗流不止，但人們還是頂著酷暑從四面八方趕來，把一個不大的會場擠了個水泄不通，連會場外邊馬路旁邊也站滿了與會的人群。據宋教仁日記稱：「時到者已六、七百人，而後來者猶絡繹不絕，門外擁擠不通，警吏命封門，諸人在外不得入，喧嘩甚。余乃出，攀援至門額上，細述人眾原因，又開門聽其進，遂罷。」結果，只能容納

五六百人的會場，擠滿了一千多人，為留日學界歷次會議所未見。這次大會盛況空前，氣氛熱烈，人們把孫中山當作獻身革命的「中國英雄中的英雄」和「四萬萬人之代表」來歡迎。時隔僅兩年，孫中山在留學生中的形象已大大不同了。

會議先由宋教仁致歡迎詞，與會者對孫中山的到來報以熱烈的掌聲和喝彩。接著，身穿一套潔白的西裝、氣宇軒昂的孫中山向聽眾發表了近兩個小時動人心弦的演講。他首先對滿腔熱忱歡迎他的留學界表示感佩，接著就救國方針作了詳細闡發。概而言之，就是充分認識中國固有的文明，認真學習西方的長處，以振興中國為己任，創造一個二十世紀頭等的共和國。孫中山一開始就指出認清中國固有文明和救國的關係。他說：「願諸君之來日本也，在吸取其文明也，然而日本之文明非其所固有者，前則取之於中國，後則師資於泰西。若中國以其固有之文明，轉而用之，突駕日本無可疑也。」他根據自己歐美大陸之行的觀察所得，指出西方文明的中心點已經由希臘、羅馬轉移到阿利安民族，所以西方的近代文明不過數百年的歷史，「而中國之文明已著於五千年前，此為西人所不及，但中間傾於保守，故讓西人獨步。然近今十年思想之變遷，有異常之速度。以此速度推之，十年、二十年之後不難舉西人之文明而盡有之，即或勝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顯然，孫中山不僅看到了中國文明的悠久，也看到了「中間傾於保守」的事實，但他更主要的是把文明的載體——民族的努力振興作為文明轉換的原動力，把吸取先進民族的優秀文明作為固有文明發展的必要條件，這就使他對中國的前途充滿信心。

在學習西方的問題上，孫中山主張「取法其上」。他批判了「中國今日亦只可為君主立憲，不能躡等而為共和」之說的荒謬，指出：「世界立憲，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稱為真立憲。同一流血，何不為直截了當之共和，而為此不完不備之立憲乎？」他說這種不能躡等論，是「擇其中而取法之，是豈智者所為耶？」

孫中山在分析了中國各種優越條件之後，認為「生在中國，實為幸福」。「吾儕既據此大舞臺，而反謂無所措手，蹉跎歲月，寸功不展，使此絕好山河仍為異族所據，至今無有能光復之，而建一大共和國以表白於世界者，豈非可羞之極者乎？」因此，他衷心希望在座諸君「將振興中國之責任，置之於自身之肩上」；「把不能躡等的荒謬想法，「淘汰潔盡，從最上之改革著手，則同胞幸甚！中國幸甚！」⁶⁰像歷次演說一樣，孫中山的這次演說沒有什麼深奧玄妙的哲理，都是自己遊歷歐美的親身感受，說得實在而真切；在駁論時，所舉事例通俗生動、觀點鮮明易懂。唯其實在真切，才可使人信賴；唯其鮮明易懂，才可使人迷途知返。

孫中山的世界眼光，對革命目標和方略的精闢見解，富有鼓動力量的雄辯口才，以及他的謙虛誠懇、平易近人和風趣幽默，都使他具有強烈的魅力，令與會者嘆服。在這個富有政治遠見和激動人心的講演中，孫中山充分估計了迅猛發展的革命形勢，熱烈地號召中國人民

60 演講演詞現存有兩個記錄稿：一、後人題作《中國民主革命之重要》，載《孫中山選集》上卷，第六十五—六十七頁，原是陳天華發表在《民報》第一號（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上的摘要；二、後人題作《中國應建設共和國》，載《國父全集》（一九九三年版）第二冊，第一百九十三—一百九十七頁，為吼生的詳細記錄（由留學生歡迎會於一九九五年九月在東京出版，題為《孫逸仙演說》）。

下定決心，迎頭趕上，不惜以流血為代價，「以謀獨立而建共和」。他強調，只要全國人民團結奮鬥，中國是大有希望的。孫中山的演說，激起全體與會者的強烈共鳴，會場裡不時爆發出一陣陣經久不息的掌聲和歡呼聲。大家群情激昂，決心跟隨孫中山為革命英勇奮鬥。

孫中山的這次演說，使那些受保皇思想所惑的留學生，「渙然冰釋」，而他作為革命黨領袖所具有的那種真切實在的個性，從此深深地印在與會者的心中。

經過二十來天的籌備後，中國同盟會正式成立於一九〇五年八月二十日，成立大會的會場設在東京赤阪區靈南阪鄰近清駐日公使館的日本人爵阪本金彌住宅內。在敵人的臥榻之旁，開革命司令部的成立之會，多少帶有點戲劇性；而有些與會者因不認識子爵府邸，據說誤將清使館當做會場，更平添了些許笑料。

參加成立大會的留日志士，一百餘人，超過了籌備會議的人數，這無疑應是留學界歡迎孫中山大會產生的積極成果。會議在下午二時正式開始，在孫中山主持下，大會議程二項：一通過會章；二選舉幹事。會章由黃興代表八人起草小組在孫中山主持下，大會宣讀，共三十條，「讀時會員有不然者，間有所增減」。幹事選舉，據宋教仁日記所載，舉得司法部職員八人，議員二十人，由總理指定執行部職員八人，合計三十六人。最後由黃興提議，「謂《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社同人半皆已入本會，今該社員願將此雜誌提入本會作為機關報」，這項建議獲得與會者鼓掌通過，至於具體改刊辦法則留待下次討論。會議開到下午五時，在全場一片熱烈的氣氛中，「大呼萬歲」聲中宣告結束。

同盟會東京本部的職員，根據參加大會職員選舉的田桐所記，照錄如下：

執行部：總理孫文

庶務部：黃興。黃興他適，朱炳麟代理之；又他適，張繼代理之；繼他適，孫毓筠繼之；

最後為劉揆一。

書記部：首定馬君武。馬未就職，由黃興薦田桐繼之；後孫中山又調胡衍鴻（漢民）、

但燾、李肇甫三人。

內務部：朱炳麟、匡一。

外務部：程家樞、廖仲愷。

會計部：劉維燾。劉未就職，謝延譽繼之；謝後赴南洋，何天炯繼之。

經理部：谷思慎、程克。

評議部：議長汪精衛。議員董修武、熊克武、於德坤、王琦、吳鼎昌、張樹枏、馮自由、

梁慕光、胡漢民、田桐、吳琨、但懋辛、周來蘇、胡瑛、朱大符（執信）、範治煥、

吳永珊（玉章）、康寶中。書記朱大符。

司法部：總長鄧家彥。判事張繼、何天瀚。檢事宋教仁。

按照會章規定，採取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的原則設立機構，總理之下分設執行、

評議、司法三部。執行部權力最重，由總理直接領導，內分庶務、書記、內務、處務、會計及經理六部；它的負責人「庶務」相當於同盟會副總理的職務，可代行總理他適時的一節職權。會上推舉黃興為執行部庶務，協助總理主持本部工作。決定同盟會本部設在日本東京，並在國內外分設九個支部，即國內設東（上海）、西（重慶）、南（香港）、北（煙臺）、中（漢口）五個支部，分轄各省及蒙、藏、新疆等區；海外設南洋、歐洲、美洲、檀香山四個支部。至於全國各省區，都成立分會；各省區主盟人也經分別推定，負責本省留學界入會主盟事務，並負責派遣人員回國活動。大會還授權孫中山、黃興、章太炎等制定同盟會《革命方略》，以供各地革命黨人武裝起義時使用（該「方略」的十一個檔於一九〇六年秋冬間制定出來）。

同盟會的成立，是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國民主革命進程中的一個重大事件。它標誌著中國民主革命的廣泛聯合，使全國革命從此有了一個領導核心，從而使中國民主革命向前跨進了一大步，加速了革命的步伐，促進了全國革命高潮的到來。孫中山後來曾經這樣論述同盟會成立的重大意義：「自革命同盟會成立之後，余之希望則為之開一新紀元。蓋前此雖身當百難之沖，為舉世所非笑唾罵，一敗再敗，而猶冒險猛進者，仍未敢望革命排滿事業能及吾身而成者也。……及乙巳之秋，集合全國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之日，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於是乃敢定立中華民國之名稱，而公佈於黨員，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義而傳佈中華民國之思想焉。」他還在同年九月三十日致陳楚楠函中，欣喜萬分地敘述了同盟會成立之後的革命新形勢：「近日吾黨在學界

中，已聯絡成一極有精彩之團體，以實力行革命之事。現捨身任事者已有三四百人矣，皆學問充實，志氣堅銳，魄力雄厚之輩，文武才技俱有之。……將來總可得學界之大半。有此等飽學人才，中國前途誠為有望矣。」⁶¹因此孫中山就比過去更加堅信自己一定能夠親睹革命成功之日。

新成立的同盟會和以往的革命小團體有很大的不同。它是真正統一的全國性的革命組織，國內十七省都有人加盟，打破了以省界組織革命團體的習慣；它有公舉的領袖，有明確的黨章、黨綱和其他各種規定；它是以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主體的革命組織，有人統計說：在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間加入同盟會的成員中，出身可考者有三百七十九人，其中留學生和學生為三百五十四人，占了絕對多數，達到百分之九十三以上，其次是官僚、有功名的知識分子十人，教師、醫生八人，這兩類各占百分之二多一點，至於資本家、商人、貧農等為數極少。這就使它區別於以往的任何一個革命團體，而成為近代中國第一個民主革命政黨。

同盟會成立後，留日學生相繼加盟的有四百多人；至一九〇六年末，僅東京一地加盟的已達八百多人；不到一年，海內外會員總數就迅速擴展到一萬人以上。在孫中山的領導和會員的共同努力下，「從此革命風潮一日千里，其進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不過，同盟會

61 《致陳楚楠函》，黃季路編：《總理全集》下冊，「涵札」，成都近芬書屋一九四四年版，第二十六頁。

是一個由資產階級、上層小資產階級等許多不同階層、集團和派別組成的革命政黨，成分比較複雜，參加的成員在政治態度上並不一致，存在著明顯的左、中、右的差別，並且組織也相當鬆懈，這就隱伏日後在政治上、組織上分裂的因素。

在同盟會本部的主要幹部中，與孫中山最為接近的有胡漢民、汪精衛、朱執信、廖仲愷等人。胡漢民（一八七九—一九三六年），原名衍鴻，字展堂，廣東番禺人，是一九〇二年留學日本，一九〇五年任《民報》編輯，用筆名「漢民」發表政論，影響甚大。他先擔任評議部議員，後任執行部中書記部書記。汪精衛（一八八三—一九四四年），原名兆銘，字季新，廣東番禺縣人。一九〇四年留學日本，任《民報》編輯，用筆名「精衛」發表文章，起過積極作用，後來墮落為漢奸。他當時擔任評議部議長。朱執信（一八八五—一九二〇年），原名大符，字執信，筆名摯伸、去非等，廣東番禺縣人。一九〇四年留學日本，一九〇五年七月參加同盟會。以後在反袁、護法運動中是孫中山的主要助手之一。他當時擔任評議部議員兼書記。廖仲愷（一八七七—一九二五年），原名恩煦，字仲愷，廣東惠陽縣人。一九〇三年和妻子何香凝先後留學日本，一九〇五年加入同盟會。以後，成為孫中山的得力助手。他當時擔任執行部中的外務部幹事，還被選為中國留日學生會會長。胡、汪、朱、廖曾在孫中山的親自指導下為《民報》撰寫文章，宣傳三民主義，批判保皇黨的謬論。廖仲愷和夫人何香凝的東京寓所，是革命黨人的通信聯絡站和聚會場所，孫中山經常在那裡集會，商議和謀劃革命工作。廖仲愷按照孫中山的指示，與何香凝等向海外華僑宣傳反清革命，駁斥改良派

的反動謬論，並經常和留學生中的保皇分子進行鬥爭。後來，胡漢民、汪精衛隨孫中山去南洋進行革命活動，朱執信回廣州參加南部起義，而廖仲愷則先後潛回天津及吉林等地，從事發展革命勢力的活動。到中國革命進入新民主主義階段後，他們走了不同的道路。思想激進的朱執信不幸早死，只有廖仲愷始終是孫中山的親密戰友。

六、提出三民主義

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同盟會機關刊物《民報》（由《二十世紀之支那》改組而成）在日本東京正式出版發行。孫中山在《〈民報〉發刊詞》中，對他的十六字綱領進一步明確闡述，首次公開提出了「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的革命號召，鮮明地樹起了三大主義的革命旗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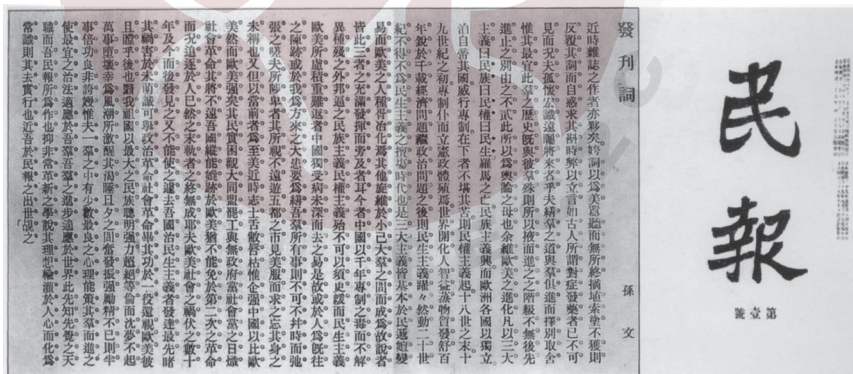
中國同盟會是以孫中山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立會宗旨的。這十六字，原是興中會「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政府」誓詞的繼續和拓展，初次使用於一九〇三年東京青山革命軍事學校的入校誓詞中，後來，一直為孫中山在他所創建的革命團體堅持使用。就這方面說，中國同盟會與興中會，尤其是興中會後期的組織活動，在思想體系上是一脈相承的。

這十六字的宗旨，蘊涵著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這就是一九〇五年十月孫中山在《〈民報〉發刊詞》中揭櫫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由於該文中提到「是三大主義皆基本於

民」，因此，世人又稱之為「三民主義」。

三大主義或曰三民主義，是孫中山從世界歷史的遞嬗變易和中國革命面臨的社會實際中得來的悟性。他在《發刊詞》中說：

余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洲各國以獨立。洎自帝其國，威行專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則民權主義起。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專制僕而立憲政體殖焉。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百年銳於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後，則民生主義躍躍然動，二十世紀不得不為民生主義之擅場時代也。⁶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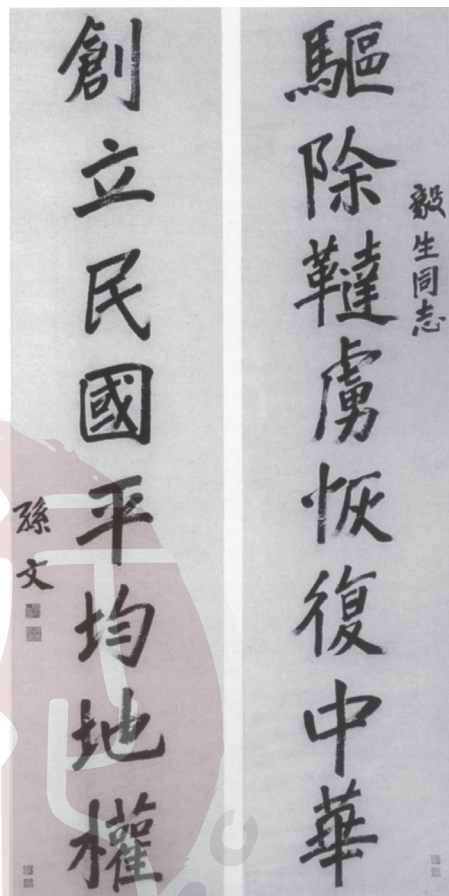
一九〇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創刊，成為同盟會宣傳革命思想、同保皇派論戰的重要陣地。孫中山在《民報》發刊詞中首次提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圖為《民報》第一期封面及發刊詞。

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到，孫中山所謂民族主義，其基本內涵是反對外來民族統治，爭取本民族獨立；民權主義是反對帝制專制、爭取民主立憲政體；民生主義是產業革命時代為解決日見嚴重的經濟問題而實行的社會革命。孫中山又說：

今者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種殘之，外邦逼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殆不可以須臾緩。而民生主義，歐美所慮積重難返者，中國獨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於人為既往之陳跡，或於我為方來之大患，要為繕吾群所有事，則不可不並時而弛張之。

從西方的歷史陳跡和當前面臨的困境，反觀中國社會，則以民族主義解決異種殘之、外邦逼之；以民權主義解決千年專制；而民生主義既然將成為中國今後之大患，則應與民族民權同時解決。他特別說明了提出民生主義的依據，強調實行民生主義的必要，「歐美強矣，其民實困」，階級鬥爭日益尖銳，「社會革命將其不遠」；中國資本主義尚不發達，「睹其禍害於未萌」，故提出「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的主張。這就是孫中山主張中國革命必須以三大主義作為宗旨的理由。

西方歷史的遞嬗變易是否按民族、民權、民生三個階段截然分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孫中山悟出了西方歷史和現實的癥結所在，並把它用作解決中國革命的鑰匙，以此構成自己的革命思想體系。所以，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既反映了當時先進中國人的學習西方、尋求救民真



孫中山為胡毅生題寫的同盟會綱領。

理的思維軌跡，又顯示了他對中國革命思考的卓越識見。

孫中山為同盟會所制訂的綱領，是以三民主義為理論基礎的。繼《〈民報〉發刊詞》上提出民族、民權、民生主義之後，孫中山又發表了一些著述，如一九〇六年他與黃興、章太炎制定的同盟會《革命方略》中的《軍政府宣言》——即《同盟會宣言》，和同年十二月在《民報》創刊周年紀念會上發表的重要演講（這一演講後來題為《三民主義與中國前途》）等，對三民主義的基本內容分別作了闡述。

民族主義所宣佈的目標，是要通過武裝鬥爭，推翻腐朽賣國的滿清貴族集團所把持的清朝反動統治，重建漢族人當權的政府。孫中山指出，「民族主義，並非是遇著不同族的人，便

要排斥他」，更不是「要盡滅滿洲民族」。「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滿洲人滅我們的國，主我們的政。定要撲滅他的政府，光復我們民族的國家。」因此，「我們並不是恨滿洲人，是恨害漢人的滿洲人。假如我們實行革命的時候，那滿洲人不來阻害我們，決無尋仇之理」。孫中山在闡述「反滿」這一戰鬥口號時，在相當程度上揚棄了不少革命黨人所持有的單純「種族革命」的觀點，並把少數掌握政權的滿洲統治者與一般滿族人民加以區別，指出民族主義不是種族復仇主義，這是一個重大的進步。同時，反對腐朽賣國的清王朝也包含了打擊帝國主義，爭取民族獨立的內容。但是，他畢竟還沒有明確提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以實現民族的真正獨立的主張，因而不能科學地反映近代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這是民族主義的歷史局限性所表現的一個根本弱點。

民權主義所宣佈的目標，是要剷除封建君主專制政治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國。孫中山指出，「民權主義，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中國僅僅有民族革命是不夠的，在進行民族革命推翻清朝的同時，還必須進行政治革命，推翻君主專制。他認為君主專制主義是「惡劣政治的根本」，說「中國數千年來都是君主專制政體，這種政體不是平等自由的國民所堪受的」，故必須把政治革命同民族革命並行，「顛覆君主政體」，去掉「那惡劣政治的根本」，「建立民主立憲政體」。孫中山明確表示，「照現在這樣的政治論起來，就是漢人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他告誡革命者不可「存有一些皇帝思想」，「當國家做私人的財產」，「彼此相爭」，弄得國家「四分五裂」、「自亡其國」。孫中山的民權主義，具有完整的共和國要求，同改良派

的君主立憲主張截然對立，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具有積極的戰鬥意義。但是，他的矛盾集中指向封建專制政體，而沒有進一步提出清除這一政體賴以存在的社會階級基礎，即推翻地主紳階級的統治，由人民直接行使權力。

民生主義所宣佈的目標，是用「平均地權」的辦法，改變陳腐的土地制度，解決土地問題，以防止資本主義制度下貧富分化的對立。孫中山認為歐美資本主義各國「文明越發達，社會問題越著緊」，如英國「富者極少，貧者極多」；「善果被富人享盡，貧民反食惡果，……故成此不平等的世界」。這種「社會問題，在歐美是積重難返」，而在中國「是將來總會發生的，到時候收拾不來，又要弄成大革命了」。

因此，在「實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時候，須同時想法子改良社會經濟組織，防止後來的社會革命」。如果發展到像歐美那樣的田地「才去講民生主義，已經遲了」。他認為，歐美之所以不能解決社會問題，根本原因在於沒有解決土地問題。針對社會經濟發達後，地價高漲，地主壟斷土地，危害民生的前景，他主張核定地主土地的現有地價，而將此後地價中因經濟發展而增漲的部分收歸國有，這就是「平均地權」。孫中山認為只有用這種辦法才能杜絕「少數富人把持壟斷的弊竇」，他不贊成「奪富人之田為己有」，也沒有能提出徹底能解決土地問題的途徑。

儘管孫中山的民生主義，帶有濃厚的空想色彩，是一種主觀的社會主義，然而它在中國人民心目中是一種嶄新的思想，而受到了人民的擁護。「平均地權」的主張，雖難以真正解決

中國人民的土地問題，但它反映了孫中山對勞動人民受壓迫受剝削的苦難的真摯同情和關懷，實質上有利於資本主義的發展，因而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至於預防資本主義的主張，則是不符合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設想。

三民主義，是孫中山的革命理論，是他從興中會以來政治思想的巨大發展，是他長期革命鬥爭的總結。既是孫中山政治思想的結晶，是他解決中國獨立統一與民主富強的理念基礎，又是在他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階段政治思想的基本內容。它集中反映了中國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經濟上的要求，同時還曲折地顯示了廣大勞動人民對於獲得土地和生活改善的希望，體現出這場革命鬥爭是一場爭取建立新的社會制度的革命。在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之前，同當時中國各家各派政治學說相比較，三民主義是最具有進步性的思想。它的內容的民主性與革命性，正如列寧所讚譽的：「表明著孫中山當時是代表了「真正偉大的人民的真正偉大的思想」。⁶³這一思想的初步形成和提出，實際上標誌著孫中山早期革命思想的臻於成熟。

三民主義，是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出現的最完備的民主革命政綱，反映了舊民主主義革命的特點。當時的中國，由於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和封建王朝的野蠻統治，使國家變得極度貧弱，造成山河破碎，人民掙扎在悲慘的死亡線上，整個國家沉淪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淵之中，瀕臨於被瓜分和滅亡的邊緣。三民主義就是針對當時中國最迫切需要解決的三個首

要問題：民族獨立、政治民主、共和及人民生活與社會進步所鮮明地提出的革命主張，為它領導的革命鬥爭制定的革命綱領。因此，這一主張，在一定程度上把握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 and 封建性質及它的社會矛盾。它既提出了「中國向何處去」的時代難題，又是一個擺脫封建王朝的統治和帝國主義的壓迫，克服空前的社會危機和民族危機的拯救方案。所以，這一主張，受到了人民的廣泛擁護，曾經給了為振興中華而戰鬥的中國人民以極大的鼓舞，從而把許多革命力量聯合了起來，成為當時革命黨人的戰鬥口號以及團結反清力量的鮮明旗幟，武裝了人民的思想，能夠動員和組織革命群眾，共同為推翻清朝統治、建立共和國而鬥爭。因此，改變了革命的現狀和進程，推動了中國歷史的前進。三民主義對革命鬥爭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不僅如此，它對亞洲一些從事民族獨立、民主革命的國家也發生了深刻的影響，如印尼的蘇加諾就這樣說過：「在青年時代，我閱讀過三民主義。……我受到孫逸仙博士所提出的三民主義的鼓舞。」⁶⁴事實上，還不僅如此，它不但產生過顯著的社會作用，武裝了人民奮勇戰鬥的思想，推動了中國歷史的前進，而且在理論方面也給後人留下了許多有益的東西。例如，孫中山為著實現民主，創立了他的「破天荒」的五權分立的政治學說，以使國家的政治體制能夠互相制約、互相監督，確保官吏成為國民的公僕，而不致成為官老爺，能夠廉潔奉公，

防範貪污腐敗。孫中山的五權憲法思想，凝聚了民主思想的精華，其中閃光之點，對今天我們的現實仍有重要的借鑒作用。

從同盟會有了這一比較完備的資產階級革命綱領後，就極大推動了革命運動的前進，促使中國的民主革命出現前所未有的高潮。



一九〇六年四月，孫中山在新加坡成立同盟會分會。圖為孫中山與新加坡同盟會員在晚晴園合影。前排左起：林幹庭、張永福、陳楚楠、孫中山、尤列、劉金聲、林義順；後排左起：吳梧叟、張華丹（張永福之弟）、張繼、陳汝河、鄧子瑜、黃耀庭、張秉庚。